

柳州的漆皮箱

刘郁卿 邹德荣

民国二十年（1931）前，柳州市附近各县，嫁女娶媳，都有油得发光的漆皮箱作为嫁妆，多则10多个，最少也有一个。这种漆皮箱（含漆皮枕）是柳州市内生产的。

从什么年代起，柳州有漆皮箱生产，已难寻根。清末民国初，比较著名的有苏杭街（现小南路）柯茂昌、李荣昌、永合3家，专业生产漆皮箱、皮枕。皮箱有大个、小个的，皮枕有双人、单人的。当时柳州交通尚未发达，外来商品，如皮箱枕头之类轻泡货物，船家多不愿运载。因此，柳州地产的漆皮箱，生意相当兴旺，特别是冬春旺季，嫁女之家，最穷的也有一杠皮箱，箱面放上床棉被。富有者一二十杠皮箱三几十个抬盒，鼓乐前导，浩浩荡荡，穿街过巷大摆阔气，其中闪闪发光的是漆皮箱。

永合、茂昌、荣昌老板，均是广东省籍人，做皮箱皮枕的工人师傅，则多属广东、湖南两省人。永合生意较大，有工人15-20人，自己制皮。他经营的多是普通嫁妆皮箱，远销庆远、怀远、运江、武宣、象县、柳城、雒容、融县、长安等地区，每月约销售100-150个皮箱、皮枕。柯茂昌与李荣昌两家工人较少，各有6-8人，这2家多数是做定货，家用皮箱，生意较永合小。此外弓箭街（今中山中路）有邹宝源，有工人5人，兼做马鞍之类配件；香签街（今曙光中路）郭兴记、怡兴和各工人3-5人，生意都很小。

民国十七年（1928年）柳州大火灾，柯茂昌、李荣昌均遭损失，没有复业。永合则改名永合宏，在曙光路西头开业，同时还开了间柯茂江，邹宝源也由弓箭街迁来这条街。

这个行业，民国二十年以后，融县长安、庆远等地，先后已有漆皮箱生产，加以运输不便，外销萎缩，而市内制革业逐步发展，全牛皮箱逐渐增多，花色

品种，均较漆皮箱优胜，漆皮箱产销路，年年下降，抗战胜利后，只有柯茂江、郭兴记2家恢复少量生产，至于漆皮枕则为绣花布枕完全取代矣。

漆皮箱的加工过程是：商店购回箱坯后（箱坯由木器行业用薄杉板做成原个箱型）自己店内师傅再加工过细刨光刨平，然后开口，蒙上熟制牛皮（熟皮分一级皮青，二级三级肚皮）。

产品分双层夹皮箱（木箱里外俱用一级青皮包过）、皮口箱（木箱外层用二级皮包过，内面油漆）、花里箱（普通一般嫁妆箱，木箱外面用三级肚皮蒙过，内面裱花纸）。漆皮枕也分皮青枕、二青枕、普通枕3种。

木箱（枕）经过蒙皮后，即油漆打底，再油漆，然后钉铰、钉锁等4道工序。

皮箱一般高9寸（市尺、下同）宽1尺3，长2尺2寸。价值最高的是一级皮青箱，每个当时值东毫10元；最低价值是嫁妆箱（花里箱）每个约4元上下。

漆皮箱工人，多数是计件工资。油漆打底，几分钱一个，钉铰工序一角。至于固定工资的工人，每月工资在10元内（东毫），店方供食宿。学徒3年期，期满后要帮师傅1年（无工资），才能离开商店另找工作。

漆箱工人，民国初年业务鼎盛时期，全市约60-70人，90%是广东、湖南两省籍人。“民十”以后，陆续有本市青年参加工作，到民国二十年（1931）后，长安、宜山、来宾等地，先后有漆皮箱生产，柳州市漆皮箱行业，开始走下坡。

这个行业产品，漆皮箱、皮枕等，原是民间日常家具用品，销路应该不愁，为什么后来竟然没落？其原因有：

一是运输装载不便。因是木箱漆面，装船运输时，既不能压，也不能碰，碰损漆面就不雅观了，因此外销受到局限。

二是产品守旧。开业时或者说传统时，生产什么商品，二三十年也是生产这种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三是没有革新产品。发展漆器的工艺技术，因而当牛皮制品及帆布制品等皮箱上市后，最终在市场上受到淘汰。

柳州橡胶工业发展概况

韦建章

一、解放前橡胶工业的萌芽

柳州市是全区交通枢纽，也是全区的工商业中心。过去柳州人使用的橡胶日用品，都靠进口供给。自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接着国内各省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直到1926年才开始地方建设。当时以引进工业技术、商品原料和物资，扩大交通运输车、船等为首要工作。

当时省府派建设厅长伍廷飏来柳，首先全面抓开辟全省公路以备运输。广西汽车公路决定以鱼峰山南面荒地（即今工人医院）为起点，兴筑的第一条汽车公路就是柳州到石龙的柳石路，自1925年11月14日提前动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于1926年9月20日修成开始通车，是广西公路先锋。接着分段兴筑，有柳州至河池的柳庆段公路，于1927年6月初通车；柳州至宾阳公路于1927年5月底通车；桂柳公路的柳榴段1928年6月通车；还有柳州至三江，柳州至大湟江等地也逐步通车。在南宁方面兴筑柳邕公路和贵县、玉林、梧州戎圩、龙州、百色等地公路皆逐步通车，总之广西大部分城市之间，汽车行驶畅通，运输业也日趋发达，这给橡胶业提供了市场需要。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14日中午，柳州河南发生特大火灾。烧毁河南过半数房屋，从鱼峰山脚一直烧到柳江河边，沿途菜地、鱼塘、住屋及附近一带地方全被踏平，事后政府因陋就简依势才修成鱼峰大马路。这就给橡胶业提供了生产、销售场所。天下事无独有偶，又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柳江路起火，当时刮大南风，瞬间风乘火势，火仗风威，冲霄火屑满天乱飞，相互串连，烧毁南、西、北三座城门辖区大半城房屋，大半居民流离失所，尤其贫苦病人露宿于颓垣破壁瓦砾之中，状甚凄惨。国内外红十字会虽有物资救济，但杯水车薪长贫难顾。为此，多数人为谋生计，各自找寻工商门路，五花八门遍地开花，各行各业顿时兴起，橡胶日用品手工业也就应时而生。过去劳动做工群众，一

般是脚穿草鞋，运货车是用木制的车轮，绑东西是用草、麻、棕等编成的绳子，但都不耐用，此时偶有识者便仿效外地，利用不能作车轮使用的废旧汽车轮胎，（引）割来制成包木车轮外面的胶条、胶草鞋、胶绳等日用品投入市场销售。经过劳动群众反复试用后，各皆认为经济耐用，对这些橡胶日用品深感满意。后来日积月累，劳动群众形成使用习惯，顾客日渐增多，而用手工割制废旧轮胎日用品的摊、店，也就日益兴旺起来。

1932 年有湖南省衡山人戴世新者，首先在鱼峰路开设“建华翻胎厂”，开创柳州翻新轮胎的纪元，除（引）割废旧轮胎制成橡胶日用品外，还选些较好的旧轮外壳，用生胶沾上装入模型中蒸熟而成翻新轮胎使用。其后逐渐有人接着在鱼峰路和附近街左右纷纷开设修、补、割胎行、店、摊等，到 1940 年鱼峰路就有 10 多家，如：杨景成开设“湘山补胎行”，胡悟梅“五常补胎行”，龙永南“水南”、覃建荣“建昌”、陈肇基“造成”、刘浩森“新华”、陈歧斌“斌记”、刘瑞珍“瑞记”、张仁明“明记”、谢沛淇“沛记”、覃少明“昇记”、廖飞雄“雄记”、黎华兴“华兴”、叶英“英侨”、谭辉“辉记”、吴其昌“其昌”等 10 多家补胎行、店，还有些小补胶摊，大多数集中于鱼峰路。当时虽然也有同业公会组，只是流于形式，未起什么作用。

二、解放后橡胶工业蓬勃发展

1949 年 11 月 25 日柳州解放后，修、割、补轮胎单干户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全市连河北共有几十个修、割、补胎行店摊。1952 年增加零星单干户在太平西街割胶制日用品摆摊销售，如周木生、韦建章、刘玉昆等。1955 年 2 月，市府派员发动各单干户，组织建立“柳州市手工业割胶生产小组”，但只有梁五、黄英华、刘浩森、杜书温、刘贵生、廖飞雄、沈德昌、刘玉昆、陈组华、杜仁阶、覃少明、胡汉荣等 12 人参加，公选黄英华为组长，地址在鱼峰路 20 号刘家，专门割制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等出售，其余单干户则徘徊观望，仍自靠单干。由于合作化进入高潮，形势逼人，同年 9 月，市府又派员组建“柳州市手工业补胎供销合作社”，加入为社员的有：陈球、伍德和、曾永文、陈歧斌、吴国威、龙永南、何土生、伍舜坤、谢沛淇、邱志荣、丁凤珍（女）、陈肇基、赖长秩、张仁明、龙永棠、刘瑞珍、黎华兴等 10 多人，公选陈球、伍德和为正、

副主任，社址在鱼峰路26号，以补胎和木车胶条、胶草鞋等生产销售。上述两个单位产品，主要销售本省与云南、贵州等地，这些手工制品却能畅销各地。

1956年2月，市手工业联社将所辖“割胶生产小组”与“补胎供销合作社”两单位合并为“柳州市手工业橡胶生产合作社”，走上合作化道路，社址在鱼峰路106号，除上述两单位成员之外，更欢迎单干户踊跃参加。组成合作社后，全社有梁五、周木生、杜书温、黄英华、刘浩森、陈组华、莫仁生、覃建荣、何土生、杜仁阶、覃少明、陈歧斌、胡汉荣、吴国威、胡悟梅、龙永南、伍舜坤、陈球、谢沛淇、邱志荣、陈肇基、赖长秩、张仁明、丁凤珍、龙永棠、梁富德等33位社员，公选胡悟梅为合作社主任。为了开展生产业务，社里派人全面了解市场日用胶产品情况后，立即派人分赴广东、云南、贵州、上海等地购买废旧轮胎及生胶回社，把各种型号旧轮胎可翻新者翻新，其余废胎割制成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销售，但产品都是手工操作，而各地消费者皆赞产品经济耐用，深受顾客欢迎而畅销。

市手工业联社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于1958年2月，把柳州市手工业橡胶生产合作社报请上级批准改组为“柳州市橡胶制品厂”，厂址在柳石路鸡窝山脚，亦叫老虎冲口处。初建厂房3间约600平方米。厂内职工以原合作社33人为基本，厂把他们分为炼胶、补胎、胶杂品、制鞋、机修等5个班，职工缺少不敷分配，其后由市上级陆续抽掉手工业联社、补胶鞋社、锰品厂、骨粉厂、雨伞厂、毛笔厂、针织厂、水厂、炼钢厂、炼焦厂、烟厂、织布厂、电机厂、火柴厂等单位职工入厂为职工（每厂约调2-10人）以充实各班人数，并调艾正维任书记兼厂长，梁富德为副厂长。至1960年底，全厂共有职工200人，资产是由合作社转厂的20万，加上近两年积累共约40多万，只能生产木车胶条、胶草鞋、胶鞋底、胶绳、补轮胎等手工操作，原材料不足时，厂里忙于派人外出“找米下锅”（即外出采购原材料）以维持生产。

1961年改属市二轻局管辖，适逢手工业归队，将其原先建厂带来的资产20来万带走。市二轻局指示以厂余资金并向银行贷款来购买炼胶机3台（其中9吋2台，14吋1台），以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除原来割制橡胶日用品外，另增加机器以制橡胶杂品——吸引管、纯胶管、三角带、平型带、胶底帆布鞋等

产品。同时厂里将 5 个班改为 2 个生产车间：第一车间主任胡梧梅，生产翻补汽车轮胎、割胶日用品、制胶杂品等；第二车间主任李世才，生产吸引管、纯胶管、三角带、平型带、炼胶、机修、锅炉等。厂里生产渐向半机械化进展，销售日渐扩大，职工增至 300 多人，产品种类逐步增多，产值亦逐步上升，上缴税利逐年有所增加，厂房宿舍根据生产需要相应扩建，资产积累约有 70 万元。1964 年改属市化工局管辖。

三、成立橡胶专业

1965 年成立橡胶专业，在北京建立“中央橡胶总公司”，下设 8 个分公司，中南区在广东设“广州橡胶分公司”，分公司在广西设立“广西橡胶总厂”，统一重新调配生产业务。总厂之下设“南宁橡胶厂”，生产水鞋、解放鞋等；“桂林橡胶厂”，生产胶配件、球鞋；“梧州橡胶厂”，生产童装鞋和胶玩具；“柳州橡胶厂”，生产一管两带；还有“桂林轮胎厂”“桂林乳胶厂”“桂林橡胶机械厂”“桂林橡胶杂品厂”“桂林橡胶研究所”等，总厂也设在桂林。

柳州橡胶厂这时将原来一、二车间，改组为：第一车间炼胶，第二车间胶管，第三车间胶带，第四车间胶杂品，第五车间锅炉、机修等。5 个车间，自成立专业后，柳州橡胶厂全靠中央橡胶总公司投资，才能不断增加机器设备，根据生产和职工生产需要扩建厂房及宿舍，供给原材料，增加产品种类，改进旧有产品，在橡胶专业化的轨道上前进。厂以一管两带为主要产品。一管：即吸引管、夹布管、纯胶管、编织胶管、钢丝编管、高压胶管、耐油胶管、耐酸胶管等。二带：即平型带和三解带。平型带又分各种型号的运输带和各种型号传动带。还有各种性能平板的胶板。真是型号繁多，不能一一尽述。1965 年底，厂里资产增至 80 多万元，有职工 400 人，年总产值 600 多万元，上缴税利 70 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售本区和云南、贵州、湖南、广东一带地方，这是我区橡胶业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才取得的成绩。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文斗逐渐转为武斗，厂内职工积极投入。武斗时两派激烈，生产几乎瘫痪。1968 年厂里生产逐渐恢复，到 1969 年才能慢慢正常生产。在“四人帮”横行 10 年中，厂里领导还是重视“抓革命、促生产”，故生产产值仍然有所上升，技术则采取走出去（即派青年职工外出学习技术经

验)、请进来(即请技术高明人士来厂传授各种新的技术方法)的办法以搞好生产,故1971年厂资产增为259万元,职工增至660人,年产值和上缴税利亦相应逐年增加,且产销平衡继续前进。

1975年厂资产增为448万元,职工有768人。厂里根据生产进展需要,决定把原三车间生产的运输带和传动带等转至大龙潭门左侧山边新起的厂房,建立第六车间,配备人员扩大生产。此后6个车间的职工兢兢业业,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前进。

1985年,厂资产又增为754万元,职工有1160人,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吸引管40万吋m,编织管22万吋m,夹布管93万吋m,三角带300万Am,风扇带9万条,输达带34万m²,传动带34万m,纯胶管40吨,胶板40吨,胶杂件35吨,发展为年产值两千万元,年上缴税利250万元。各种产品以销售区内为主,区外销售有: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国外则销售东南亚及香港各地。

柳州橡胶厂自建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生产逐年稳步上升而成现在的崭新姿态,生产继续向前发展。目前我市除柳州橡胶厂外,还有在1961年由柳州橡胶厂办手工业归队而组成的“柳州市橡胶塑料厂”“柳州市民政橡胶厂”和各街道办的小型橡胶厂等,都对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使柳州市橡胶业繁荣兴旺,必须继续努力,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沿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向前迈进。

1988年11月韦建章稿于

柳州太平东街40号

新桂系在柳办理军校之经过

梁志强

1930年7月，打着“北上护党”旗号的桂、张（发奎）两军在湖南衡阳七塘一带被粤军击败，狼狈退回广西。在此之前（1929年末和1930年初），桂、张两军与粤军开战，已遭两次败北（首挫于广东从化，再败于广西北流），加上这一次，下层骨干基本伤亡殆尽，故残部退回柳州整编时（仍虚张声势编为第4、7、8、15四个军，每军两师，每师两团），虽然七拼八凑，连以下干部仍然缺额甚大。为健全组织，尽快恢复元气，以应付不利之局面（当时南宁桂林受滇军、蒋军包围，浔梧和田南被粤军、滇军占领，桂系地盘只剩下柳州区区之地。军心动摇，粮穷弹尽），乃决定重办军官学校，培养一批“忠于团体”的“中坚”，继续实行封建割据。但对外则标榜办校目的“在于养成绝对服从党旨、为民族谋解放之真正干部”，“本革命之职志为主义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国利民而战。”“以担负护党救国大业，扫除个人独裁，恢复党的权威，建设国际、政治、经济平等之中华民国。”

8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正式在柳州组成并举行开学典礼。由“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校长。100余名工作人员和600余名学员全部系由各军抽调或保送（一些史料说该校是从南宁迁来，非也）。校址设于广西省立第四中学（今文化大院）。

8月底，由各军保送的900余名学员全部到齐，即编成步兵3个队，炮兵、工兵各一队。沿接前南宁军校之期秩称第四期，学制为半年。未几，白奉令率兵解南宁滇军之围，校长一职交师长李泽民代理（不少史料说该校在柳州一成立，校长即为薛岳，也有的史料说薛岳是副校长或南宁军校校长，薛其实是柳州军校第二任校长，接任该校的准确时间是1931年2月）。李抵任后，将学员重新编组，第一队为机枪队，二、四队为步兵队，三队为炮、工兵及经理队。

次年春，由于发生“胡汉民事件”，宁（南京）粤之间产生齟齬，粤方为

自身计，主动与桂通款言和，化敌为友，联合一致反蒋。接着，汪精卫、孙科南下，开府广州，公开与南京对抗。随着两广关系之缓和，军中需求干部也就不似以前迫切了。为使学员获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当局决定将该校学制展期6个月，即由半年改为一年，并任薛岳来长斯校，以陈芝馨为教育长。

薛抵任后，锐意刷新校政，大刀阔斧整顿校风，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是更易校名。他认为，要使全体员生真正养成为党的武力，担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首先应在学校名称上予以鲜明的标示。经报请（广州）军事委员会同意，将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

二是清理教职员和学生队伍，留强汰弱，按程度重新编组。“因彼等全系由各部队抽调或保送而来，程度不等，良莠不齐，实施教育每感困难。”薛就职后，即召集会议统一认识，重新制定取舍教职员和学员的标准，公开举行甄别考试。结果，有数十名教职员被辞退，400余名学员被遣返原部。余下重新编为四个队，第一、二、三队为步兵队，第四队为机枪、炮兵、工兵队。以黄占春（上校）、刘建常（上校）、王景宋（上校）、郑沧溶（上校）分任一、二、三、四队队长（后郑因事去职，四队队长一职由少校工科队长梁寿笙代）。少校廖梦麟、褚兆刀、彭鸣皋、梁俊杰、刘赤、张毅民、黄敬之、邓光伦、梁栋楷、崔坚、石维瑶分任区队长。各区队副则由少校朱岳、陈萃文、上尉刘定寰、廖鼎、廖福、唐华英、刘月鉴、莫家新、林绍殷、莫谅成、覃克恭、姚大年、赖和平、中尉韦兴等担任。并在第四队内设无线电区队，从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30余名，以洪范（少校）为队长，借柳江图书馆开训。上校军事教官毛林翰、洪世扬、何鹑、韩舜民、中校军事教官符维屏、骆继光、范雨生、夏炳智、黄欣培、中校政治教官王伟矩、少校军事教官岑铿、潘奋南、朱乃瑞、汤庆杰、方定挥等继续留任。

三是加大政治训练比重，并将原有的政治训练科扩充为政治训练部，以韦永成（上校）为主任。于学术研讨之外，大力向学员灌输反蒋内容，培养反蒋意识。让每个员生明确：“蒋贼中正以个人独裁，藉党营私，使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奋斗牺牲所得来之光荣胜利，为个人所劫夺净尽！于十八年（1929年）春间，更跋扈嚣张，毫无忌惮以指派代表为方式，包办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

以造成个人中心势力，于政治则任用私人，贪赃枉法；于军事则扩张嫡系，诛锄异己；于外交则丧权辱国，甘心媚外；于经济则滥发公债，擅借外资……已堕落成为叛党卖国、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激发大家对蒋的仇恨，死心塌地追随当局反蒋。

四是建立各种组织，健全各种制度。①组织法规委员会，负责设计、制定本校之法规；②组织考核委员会，定期考核员生勤惰优劣，提出奖惩意见；③组织军事研讨会，以收切磋之益；④组织经理委员会，实行集体理财，经济公开，以保障员生利益不受侵犯；⑤组织消费合作社，经营各种日常用品，解决全体员生之福利；⑥建立校务会议制，定期研究学校兴革事宜；⑦建立学科、术科会议制，以释学术方面的疑难；⑧建立教育、队务会议制，讨论和解决训练及队内事务；⑨建立校、队朝会制度，每天，从校长到学员，一律于4时30分起床，集合校（队）本部，听校（队）长宣布当日应办之事项；⑩组织共乐会，定期开展活动，从各方面活跃学员生的文娱生活；⑪严格施行“四大禁令”（禁嫖、赌、吹、逃）和“两小禁例”（禁饮酒、吸烟），从校长至学员，一律奉行；⑫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特别党部”。从5月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经全校党员大会选举出黄占春、王揆一、李大光（少校秘书）、骆继光、王伟矩、熊耘（第四队炮科学员）、黄均超（第一队学员）为执行委员；谢宝树（少校秘书）、李治平（少校教育副官主任）、李萱（第二队学员）为候补执行委员；陈芝馨、王景宋、刘建常为监察委员；韦永成、唐建新（第四队炮科学员）为候补监察委员。

经此，学校工作大有起色，面貌焕然一新。正当薛岳准备进一步施展其抱负时，张发奎从汪精卫处获悉，蒋、汪可能再度合作，于是，向薛岳交底，要其立即辞去校长职务，做好随第四军离桂附汪的准备。薛是张的部属，唯其马首是瞻，于是向当局递交辞呈。李、白挽留不住，只好委教育长陈芝馨接充该校校长，并任余华沐为教育长。

陈接任不久，为检验学员学习成果，于8月7日至23日，举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实战演习。5个队沿着长塘、凤山、上雷、东泉、沙埔一线进行“攻防对抗”推演，结果颇为满意。

9月1日，学校特别党部向全国发出“东电”，声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卖国罪行”。

9月4日，该校举行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派总办公厅主任张淦、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宗骐由邕赶来参加。宋醉石代表来宾在会上诵诗一首：“鲜红一腔血，昂然一颗头，但愿一块砍，毋使漫野流；血为涤腥瑕，头为护万家，头断血亦喷，开成民主花。”

同月下旬，分配工作一结束，学校即奉命由柳迁至南宁，筹办第五期的招生工作（有的史料说“薛岳辞职后，柳州军校无形停办，军校第五期的设置，无异从头做起”。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迁邕前夕，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该校于10月6日发出抗日救国通电“鱼龟”，表示“断难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发誓要为东三省殉国诸烈士复仇”，“万死一生，义无反顾”！

资料来源：

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

②《人物传记》第六、十四辑

③《本（第四）集团军奋斗史》

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四期同学录》

⑤《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7月29、30日，9月3、4、8日，10月9、

21日

从《新华日报》看沦陷前和光复后的柳州

陈佚生 整理

1944年11月15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柳州市区，从此以后7个多月的时间里，柳州遭到了建城2000余年来空前的浩劫，人民遭受掳掠和屠戮，建筑物被焚毁，昔日繁华的桂中都市变成了一座死城。1945年6月29日，柳州光复了，居民们重返已不存在的家园。可是，胜利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马鞍山顶，乌云又笼罩了东门城楼。柳州在沦陷前和光复后的情况，1944年（缺6月份）——1945年的《新华日报》上有零星报道，现整理出来，愿对当年亲见亲历的同志回忆时有些帮助。

一、日寇侵桂前的柳州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区美军的强大攻势下，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侵华日军为了寻求出路，发动了湘桂战争，目的在“打通大陆通道”。当战火在湖南蔓延时，柳州虽受到战争气氛的影响，但居民们仍“处变不惊”，一切照常进行。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21日《新华日报》第二版有题为《柳州物价在波动》的报道：柳州本来是省商业、交通中心，也曾有过“黄金时代”，但近来市场却一天天冷落了起来。春节期间，仅柳江路各大商行宣告停业的就有20多家了。春节前，物价波动得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减退或稳定的倾向，日用百货比起桂林来都要贵些。

2月29日该报又有一则《柳州米价发生激烈波动》的短讯：本市米价近来发生激烈波动，原因是乡下米粮减少进城；同时河水干涸，水力不足，水碾出米量大减，而市上酒商熬酒需要食米的数量都在增加。县府已下令禁止酒商用米熬酒，同时派出纠察队检查粮商积米，规定不得储备3个月以上的粮食。检查结果，在河北西大路90号，河南谷埠下街裕丰号，谷埠中街衡兴，谷埠上

街广胜，接云路公兴、张元凯等6家米商没有加入粮食同业公会，私自囤米发售，正严审办理中。

由于物价上涨，“柳江县苦力、理发、人力车、土木、车香、缝作、革履、印刷、旅店等各职业工会工人，因为物价高涨，生活不易，要求增加工资。总工会已向各方请求增加工资50%，但还要等柳州评价会议评定后才能实行。（见《新华日报》民国三十三年3月17日二版，往下引用只注日期，年序用公元）。

物价冲击了金融，“柳州市上，在上月底忽然传出谣言，说银行限制提出存款，一时各银行都发生挤兑现象，幸而没有多久就告平息。当局在追究谣言来源。”（4月25日二版）

物价影响到能源，“柳州电厂于月前试机，使全市大放光明。该厂因燃料问题不能适当解决，又受物价上涨影响，困难很多。据宋厂长谈称，该厂在去年夏季就已在湖南定购大批湘煤，但先后由铁路运到的只100吨，不够用，只得转向柳江上下游采购质量较好的烟煤来补救，可水路运输也同样困难，到现在还没运到。该厂现使用的柴油机和木炭机因动力和成本昂贵，去年亏损500余万元，今年2月份就亏了50余万元，因此感到不易维持，望有关方面设法给予解决。”（4月25日二版）

物价影响民生，“柳州冬令救济会到4月下旬才补发贫民救济金，每人25元，并通告过期不领的不再补发。这也算是‘夏行冬令’的一种。”（5月24日二版）

这四五月份，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柳州的一些简讯，如“广西省府为开发天然富源，打算和英商远东公司合资办理柳州鸡喇水力发电工程。现已电请资源委员会派人到柳州考查，认为前途希望很大。”（4月10日二版）“柳州市已经呈准筹备设立，现先组市政计划委员会，由市政处长杨毓年为主任。”（4月8日二版）“柳州各界5月7日祭唐刺史柳宗元。柳宗元的坟墓在柳侯公园里，墓前苍松翠柏、风景很好。”（5月29日二版）“第X战区阵亡将士公墓最近将在柳州动工建筑，建筑费共500万元，——由雕刻家郑可设计。”（同上）

1944年夏，湖南前线告急，柳州抗战呼声也日高。湘民南迁，市场一度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象，衡阳失守后，黔桂铁路呈现行路难的境况。部分文化人流落柳州，生活窘迫，但仍不忘抗日宣传。

是年7月2日,“柳侯公园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晚会,这是柳州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所主办的‘一切为前方’诗歌朗诵夜会。到会文化界、戏剧界、音乐界人士很多,节目共分三部。第一部‘吹起进攻的号角’,计有《吹号者》……等7首,还有口琴独奏。第二部‘怒吼吧,柳江!’……还有舞剑。第三部‘再来一次总动员’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也参加演奏。”(7月18日二版)

在文人高呼抗日的同时,也有投机商在忙着发国难财。有一篇《黔桂道上》的通讯说:“柳州市面相当安定,这平日号称为商业中心城市,市场交易依然是非常活跃。因为有很多游资乘机收购衡阳、桂林等地因疏散而削价抛出的货物。这班投机者就把货物当行礼包裹免税运往筑、昆、渝各地,这又是一件获利百倍的生意。”(8月5日四版)

“城站因车的班次没有一定,有时从清晨5点起一直到第2天中午才卖票。每个人限购5张,有票贩从中倒卖,一张560元的三等车票卖到1000至1500百元。抢车票的剧烈、迅速而慌乱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同上)从这则通讯中,可看出衡阳吃紧后柳州的交通状况。该报8月11日有一篇《动乱中的桂筑行》也说到铁路的拥挤情况:“从桂林到柳州现行顶快得一天一夜。一进柳州城站大门,地上睡满了旅客,堆满了行李。售票窗排着一长列人,站着蹲着的男女老少都有,而票窗关得死死的,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买三等客票的都在前一天晚上甚至白天,就站到票窗跟前了。头等车已经撤销,二等车照规定要先登记再按次序买票。二等车票价是1129元,黑市在1万元以上。据站长说,每天从柳州直开独山,只有一班车,这班车里只有一辆二等车,照规定可以出售60多张票,现在已超过规定,每天卖上90多张。柳(州)独(山)特快平时只走22小时,现在却走了4天。还有走7天9天的。”

行的问题难解决,跟着出现了住的问题。8月13日该报一篇《疏散声中看柳州》中反映:“自从桂林疏散以来,柳州顿时热闹起来,但这个小城无法解决住的问题,旅馆家家客满,柳江上的篷船每夜要二三百元也住满了。房租涨价真惊人,一座木板房(3间)每月要5000元,起码先交3月;小洋房更不能想象,每月1万5,先交一年——18万元。”

逃难的人群中，有一批文化人。据该报8月5日的一篇通讯提及，“柳州现驻有新中国剧社，抗宣四队、九队，边政大队和业余剧团等戏剧团体，不久以前曾公演‘怒吼吧，大后方！’……可是，这一群在艰苦的物质生活和并不自由的精神生活下倔强地挺立着工作着的戏剧工作者，实在值得人们崇敬。”8月12日又有消息说：“从长沙、衡阳、桂林等地疏散来的剧人相当多，他们仍然坚持在戏剧岗位上，努力于动员民众的工作。演剧四队、九队和中国剧社最近集体创作了一个四幕剧，名《四城记》，以长、衡、桂、柳四地的战时动态为背景，执笔者为汪巩、严恭、吕复等，内容比‘怒吼吧，大后方！’更加充实完整，将由赵明、许秉铎、张客等联合导演，由3个剧团联合演出。”8月11日报道：“新中国剧社原来的待遇已极清苦，到柳州时更窘迫，每月200元津贴取消，除靠长官部发军米一天两餐外，只有演剧收入勉强维持……”。8月16日报道：“艾芜在柳陷入穷途，妻儿几口嗷嗷待哺，想回川中又无川资。徬徨在柳的司马文森、周钢鸣、韩北屏挈妇携雏，和艾芜一样狼狈。文章无地发表，可怜的稿费收入也绝了来源。8月13日报道说：“许多文化人从桂林疏散到这儿，有金仲华、艾芜、司马文森、穆木天等。衡阳《大刚报》7月10日在此复刊，还有几个报馆要搬到这儿来出版。于是，柳州的文化界也热闹起来了，文化界扩大抗日宣传委员会主办过音乐会，发动过国旗献金。”

同是文人，也有食公自肥的。9月25日该报载：“由于西大校长李运华忙于挪用经费做生意，无心准备学校搬家，后来在师生督促和舆论指责下，才勉强把一部分学生送到融县，图书仪器也搬出了30多箱，理工图书仪器素称丰富的西大，总算保存了这点产业。教授因为学校压下了6、7、8三个月的薪水，大家对这早已不感兴趣，开课大成问题，学生陆续到融的有500多人，还有500多人流落在柳州，其中160人住在农学院。由学校每月发700元生活维持费。照一个月前的柳州生活程度计算，只能吃7顿中等的客饭。因此有一部分战区同学没有别的接济，只能两天吃一顿烧饼过日子。”

二、疏散声中的柳州

早在湘桂战争爆发时，柳州行政当局就动员过居民疏散。后来由于战事发

展并不像执政者想象的快，于是，又把疏散一事置之脑后。当衡阳被围后，又重申前令。据该报 8 月 13 日报道：“7 月 18 日起，过去曾延缓过的疏散令又执行了。茶馆、饭馆、经纪行、布店、戏院以及特察里，必须一律停业，不然就不许请求车船票。从衡阳、曲江、桂林等地疏散到这儿的人，刚站定脚跟又得走，更感到苦。许多人早已把带出来的一点有限的现金和东西卖光了，于是沦为叫化度日的难民群，可是这儿又不许停留！”“天气热烈得到百度以上（华氏），但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是人，到处堆满了东西，于是盗窃的案子也就多起来了，大多是外来人倒霉，夜里容易失窃，白天一不小心身边的东西也就不知去向。”“另一面是乐而忘忧，柳江水上食堂拥挤得有时要等上 1 点多钟才有空席。五六千元的筵席实在变成太平常，这些大多是在生财有道的暴发户。食堂老板曾在报上大登启事说招待过柳文化界，免费短期住宿，但条件是夜深客散以后入睡，第二天清早起来。文化界人士大都住在龙城和柳州两中学，没有去打扰老板。”

9 月 13 日的通讯说：“衡阳失守后，战事稍缓和，由桂林迁柳的人又回去了一部分，本地疏散出去的也都纷纷迁回，平码经纪行、布匹店等都已奉准复业了。特察里和茶馆，也在请求复业。”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邮局包裹舞弊案和 8 月 15 日发生的城站大火案。这两宗案情已有另文介绍，这里就不重赘了。

9 月初，衡阳日军向广西进犯，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仓惶下令限 9 月 12 日疏散完毕，柳州也为之震荡。该报 10 月 3 日报道：“柳州正在紧张状态中，人们见面时唯一的话题便是疏散。全市商店差不多十分之八九宣告休业。柳州银行业共计 23 家，内 18 家商业银行已全部撤退到独山和贵阳。开金城江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旅客拥挤，因为行车没有一定的时间，由柳州到独山要七八天甚至十几天。如果要搭汽车，那就只有做黄鱼，每人至少要费 5 万元。从柳州疏散到宜山和长安镇去的人，大家都徒步前往，扶老携幼，非常艰苦，因此，报纸呼吁‘再没有地方可退了！应该用全力转换战局’。”

10 月 5 日有一篇《柳州疏散困难》的通讯说：“疏散问题真严重，交通工具这样少，而急待疏散的人和物资又是这样的多。公路局方面，客车已经好几天没有开出，开到独山去的 100 多辆汽车还没有回来，等公路局的车子真比登

天还难，每个人都有这样感觉。有钱有办法的人便纷纷做黄鱼了。柳州车站因为开的车子太少，车站上的行李货物堆得象山岗一样，偶而有一次车子开出，但也全部为机关封用，疏散的民众还是无法登车。至于南下的水道，以前停泊在柳江的大小船只，差不多已经走光了，航联社也离开沙角用火轮拖到鸡喇去办公，他们更加无法无天，在几天内，就把鸡喇到桂平的轮船票抬高了很多，现在黑市已经卖到每张 5000 元了。”

10 月 14 日该报又有一篇通讯反映“黔桂路上逃命难”：“刚由柳州来渝的人谈，由柳州到重庆每人约需 10 万元，但这还要有党政方面的关系才行。至于一般百姓，即使有钱也休想有舟车之便，一般百姓大多数只能徒步或乘牛车、手车等一段一段前进。现在柳州一带汇兑已极困难，那里有无数等候重庆汇款逃难的人，但重庆现在已无法汇出。

“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到贵阳的某君谈称：他和他的家人 9 月 8 日到 12 日 4 天里，把行李交给柳州城站过秤，持有收据。13 日亲眼看着行李装进铁篷车箱，然后才挤爬上火车向独山疏散。一路上，因为火车缺煤，不能开行，又爬上开往南丹的一列煤车，到南丹后，又没有煤；于是再设法爬车，但这次的车箱是特别挂的专车，老百姓无资格插足，车顶早已坐满，只好抱坐机头，人、煤混杂在一起，又被人乘机敲诈，向乘客收费每人 500 到 1000 元不等，好容易全家老少在 9 月 24 日到了独山，满以为行李已经先到，但到车站一问，独山车站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曾一再打电话给宜山黔桂总局局长设法，也没有得到结果。和他处于同样情形下的旅客极多，他们曾建议请路局设法把行李由汽车装运，所有运费由旅客负担，但也未为路局所接受。他们久待独山，坐吃山空，不得已只好向人借贷，再辗转来黔。他们对黔桂路的交通实在感到痛心已极。”从这篇通讯，可看到当时的混乱情景和难民的困境。

10 月 19 日刊登了一份桂林百货同业公会理事兼桂林浙江旅桂同乡会理事许有恒为了黔桂路的交通问题代桂柳疏散难民向当局的呼吁书，其中除要求解决黔桂路交通问题外，许氏还指出：“中途关卡把疏散当作生财之道，手续稍有欠缺，即被敲诈。如衡阳亨达利因为疏散证没有经过衡阳关盖章，在柳州南站海关分卡私诈现款 10 万元了事。桂林亨达利因为疏散证上未具花名，也被

柳州南站海关分卡勒索 50 万元。后以现款 7 万元、皮鞋 4 双、手表 5 只约值 18 万元交上，方始发还。”许氏要求当局立即调整黔桂路的交通，同时对于沿途关卡及检要处的非法敲诈，也请加以制止。

10 月 30 日登载了一则在柳戏剧工作者的消息：“柳州的剧兵们为了加强黔桂路的抗宣工作，有一部分已经在 10 月 2 日徒步到宜山去，怀远剧团和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九队的每个同志都带着轻便的行装踏上旅程。剧宣四队由桂林徒步去长安转回柳州，他们奉命暂时留柳。到 10 月 5 日为止，他们仍在这个疏散的城市做宣慰民众和部队的工作。”

9 月 12 日，桂林《广西日报》以特大号标出了黄沙河我方军队转进的消息，柳州更是加紧疏散。11 月 6 日，《新华日报》载《从桂逃筑沿途见闻》又写到柳州的情景：“……商店关门，街道两旁摆着若干地摊，湘桂难民在这里出售他们唯一的财物，然而购者寥寥。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谁还有心肠搜购多余的东西呢？街上除了武装人员之外，来往行人莫不带着紧张状态。在柳州的 3 个车站——城站、南站和西站的候车室里，早已挤得满坑满谷，月台上和四边广场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堆积着如山的货物和行李。黔桂路列车行车已无定时，有些旅客已在车站上住了十天半月还没有搭到车子。公路局的客车也极少，开往独山的汽车往往一去不回，不能再载第二批乘客。搭汽车似乎只有做黄鱼的一途，每人至少需费 5 万元。包一辆车需 80 万元到 100 万元不等。柳独间商货运费每吨达 22 万元，听之令人咋舌。”

据该报 11 月 18 日转载中央社纽约 16 日合众社电称：美国全国各杂志今日都刊载中国战区的大幅照片。照片是新闻画报摄影记者甘包勒所摄，图中可见难民在日军围攻柳州时逃难情形。这一照片曾分送给美国各通讯社，同时并分发全国各地。纽约报纸都用显著篇幅刊登照片，有用全面篇幅载出的。各报标题有的是：《中国人民争取生存》《中国难民逃离日军魔掌》《可怕的日军节节前进》。

三、沦陷前后的柳州

《新华日报》在民国三十三年 11 月 10 日第二版上，用大字标题，在头条

位置登出“敌分路犯柳州，柳江陷落、来宾有激战”的消息。以后几乎每天有柳州方面的战况报道。11月11日载：柳州柳城近郊激战，雒容陷落，敌犯来宾迁江。”13日载军委会12日发表的战讯：“柳州城郊激战现继续中，双方伤亡都重。”14日载军委会13日发表的战讯：“由东北两面向柳州进犯敌军，9日东面由三门江渡柳江猛犯东郊。另有2股由三门江以南渡江，一股经鸡喇街犯南郊，一股绕西犯南郊。北面敌军由大七南向北郊进扑，我军浴血迎战，在窑步村、太平圩、头背山、凤凰岭、兵营岭和火车北站等地和敌人搏斗，到11日晚双方都有伤亡。11日拂晓前敌军一股由火车北站突入市内，发生局部巷战，现仍进行中。”15日载14日战讯：“柳州巷战进行到11日晨六时，我守军将突入的敌人歼灭大半，6时许敌人又陆续突进，各街巷都发生激战，搏杀至晚，我按预定计划安全进入新阵地。”至此，柳州全部在敌军控制之下。这群失去了人性的兽兵，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据《新华日报》民国三十四年(1945)1月24日报道，“柳州成了死市”：“敌据柳州后，对我群众强行勒索，无所不为，近又迫令每一乡村出米100担，青年女子50名，稍不遂意，烧杀随之。我民众愤敌暴行，纷纷离城或加入当地自卫队杀敌或设法内迁。现柳州城内已成死市”。7月5日，该报刊登了一篇中央社记者在柳州光复后的7月2日乘机在柳州上空俯视地面所见的通讯说：“当飞到柳州上空时俯视地面，所见到的只是矗立的危墙和一片红色的火烧后砖瓦而已。机场上敌人所埋的地雷正待清除，市区房屋10间有9间被焚毁，从前的繁荣市场，已成一片瓦砾。河南损失比河北要重，幸存的房屋，河南只剩下十分之一、河北还剩十分之三四，但都已残破不全，比南宁受害更厉害。”22日刊登一则中央据美新闻处20日从柳州获得的电讯说：“日本人破坏柳州是有计划的，这远超出军队需要之外。敌人退出柳州时决定纵火焚烧，彻底破坏。敌人烧不到的地方就派傀儡汉奸去干。每烧毁劫掠一幢房屋得到法币3000元。敌人对每家居民给10分钟的时间搬运其贵重物品，然后敌人就任意掳掠，最后把剩余的一切搬回房内付之一炬。柳江河上铁路大桥已被敌人破坏。以前繁华城市，现在只剩躯壳了……”

1945年夏，从柳州西进之敌节节败退，6月中旬，《新华日报》几乎每天

都有柳州方面的战讯。据军委会 20 日发表的战讯称：我军已攻克距柳州西南 20 里处公路上之拉堡，该处距柳州城南飞机场仅 10 里。我军另两支部队于同时攻迫柳州西南两面郊区，正与敌战斗中。21 日战讯称：……我沿宜柳公路线追击前进部队……至 19 日与沿柳邕公路东侧攻击部队会合于距柳州西南 20 里之思贤村地区，现正准备协力向柳州郊区之敌攻击中。23 日战讯称：我军继续沿黔桂铁路、柳邕公路和柳州公路线向柳州攻迫。我军攻达柳州城南飞机场及城西柳江南站之挺进部队，22 日晨仍与敌激战。24 日战讯：我军已进至柳州城西郊之柳江南站，协力挺进部队攻击据车站内顽抗之敌，至 22 日晚，毙敌百余。25 日战讯：我军由长宁乡（柳州西南 20 里）沿黔桂铁路向柳州推进，略获进展。26 日讯：……进至柳州城南机场地区之我军，正协力挺进部队向据飞机场顽敌攻击。柳州城西地区我军现已渡过柳江至东岸，并攻占距柳州西北 10 里处之据点。28 日讯：我军 25 日完全攻克柳州西郊之柳州南站，同日并攻占城南飞机场一部。敌由城东南羊角山增援反扑，仍被我军击退，毙伤敌 200 余。我军扫落柳州西北洛满圩及西南三都圩各附近残敌，现已大部肃清。29 日讯：我军 27 日完全攻占柳州城南飞机场……。30 日讯：我军于 29 日下午 12 时克复柳州城。柳州沦陷 7 月又 2 旬，该处为黔桂铁路之接合站，该城为我克复后，黔桂铁路全段已完全重入我军掌握。

四、光复后的柳州

有一位中央社记者在柳州光复后的第 4 天陪同军方到柳视察后，有文章登在 7 月 5 日的《新华日报》说：“民众回来的正从各乡赶回县城办理善后。据某负责人说，盘据柳州的敌人为了掩护西江残敌向桂柳溃退，因此用重兵分置于柳南作坚决顽抗，我军在三都、里高、穿山、鸡喇等地曾经几次和敌人激战。记者检视卤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有日皇日后—圣旨—‘令旨’。一件说内外情势益形多难，汝其自重自戒。一件说战局日趋危急，值此帝国面临恒古未有重大时机之际，愿各自爱，勤勉奉公等语，足证明敌人之悲哀与没落。”该报 7 月 13 日刊登一则美联社记者于 10 日发出的电讯《柳州城内到处是地雷》说：“日军从中国东南溃退的时候，柳州又遭一次战争洗礼。该城现仍时有爆炸物突然

爆炸而引起死亡的事件发生。自7月2日以来,美国专家在柳州外前第十四航空队基地一带每天移去或引发地雷有20到30个,整个机场都是大地雷阵地,特别在跑道、汽车路及败退日军猛烈抵抗之处为然。甚至通往城内的道路也埋有地雷。”7月22日该报登了一篇美国新闻处7月20日发自柳州的电讯,题为《劫后柳州一片瓦砾》,文中说:“柳州全城已遭焚毁,这是敌人不必要的兽性的破坏的证明。柳州原是广西最繁华城市之一,现在寂无人声,中国军队收复柳州已有3周,柳州仍然是一片瓦砾与焦木,只剩下一副城市的躯壳,墙倒屋塌,无日无亡。本城人口一度数达十万,现在只有数千,难民已经有人回来。”

国立广西大学于10月12日已从榕江迁回柳州鹧鸪江,定25日复课。这一消息也在10月23日的报上登出。

抗战胜利后的柳州市民,没有享受过一天胜利的欢乐。10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柳州驻军虐杀人民》的“柳航讯”:“最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柳州及其附近地区接连发生了4次军队欺侮老百姓的案子。第一次是在9月16日,河南太平东街一巷2号居民梁老五,家营小生意,经常要备水数缸,但被驻军××军团输送二营六连王排长建忠强用了两缸,影响到梁老五的生意。当该排长再要占用第3缸时,梁老五因提出抗议,竟被该排长用梨木头活生生的殴打,继即毙命。这事引起地方人士非常愤怒,该凶手暗中使人送抚恤费15万元。柳市警备部闻讯,即拟提该凶手法办,但没有结果。据说该凶手已坐飞机‘调走’了。第二次是在本月2日,河南驾鹤上街的一个老百姓被两个军人活生生的困死了,事后才发觉,死者又没有亲人,所以两个军人的姓名和番号都无法知道。第三次在本月3日,县属思贤乡帽盆村的村民黄发达,无故被××军第三团第二连士兵数人押起说是有‘盗窃公物嫌疑’。黄发达家属向柳市警备部报讯,经该部两次调查,未获结果,黄发达也下落不明。第四次发生在本月4日,河南鱼峰路老龙巷3号的居民,在深晚时被不明番号的军人数名闯进屋内拉人,并未会同街甲长前去,且用武器威迫。这些事件的发生,柳市人士愤慨万分,大家都认为这是由于人权不被尊重,政治没有民主的缘故。”11月12日该报又有消息说:“柳州谷埠街10月14日有某部士兵硬指一苦力为逃兵,想拉去补充兵站,经苦力解说,士兵仍不理,竟动武殴打。

后引起街邻公愤，纷纷喝下，警察赶来把士兵拉去始了事。”

10月28日该报有篇《柳州景象》的长篇通讯，反映了柳州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现在全文抄录于后：“5日晚间，河南接云路大火，整个河南的天空都烧红了，到更深未熄。事后统计共烧掉民房百间，大批灾民无处可宿，情形很凄惨。

“秋深北风高，市内危墙塌倒的常有所闻，夜间行人莫不惴惴自危，但当局全不去管，整天埋头于新市区图的设计。

“柳市战前繁华景象到今天还没有恢复，除金银业外，其他各行生意都很清冷。百货、匹头、日用品虽自广州和广州湾等地源源运来，但商家见市面如此萧条，都袖手旁观，不愿收货。黄金交易曾经轰动一时，现在比较平静，只有银货仍很少，商人在这上面还可做些投机生意。百物中跌得最惨的算桐油，柳州光复时曾卖到2万元一担，现在跌到7000元一担，还不容易脱手。本省产桐很多，这一来，农人吃亏就大了。

“‘双十’节晚间柳州提灯巡行。当局命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都要参加，整个行列约有2里长，巡行市区时寂寂寥寥，连歌声也没有一句，许多五六岁的小学生也要跟着武装队伍一起跑，离柳州市30里以内的乡间各小学生都要赶出来参加，为了表现‘万民腾欢，却苦了小孩子的腿’。

“市民渴望已久的电灯业部分恢复，小南路上的大金号和大商号都已经享受已有一年看不到的‘光明’，但旁的地方还在黑暗中。

“国立广西大学从榕江迁回柳州，择定城郊20多里远的鹧鸪江前十六集团军附设工读学校校址，定期上课。连日正在举行新旧生登记，来者寥寥，新生报名的日期也因此一延再延，但报名的并不多。这些日子里，读得起书的人一天天地减少了。

“在复员声中，滞留柳州急待回乡的人成千成万，但大多数都因为路途遥远，川资无着而不能就道。救济机关虽然整天‘忙’于办理救济难民回乡，但有名无实，黑幕重重，比方最近到柳的‘海龙’电船被封了，说是要先送难民回乡，所有上了船的自费回乡的人都被赶上岸，实际上怎样呢？船是被封了，搭到船的人是高价买黑市船票的‘高等难民’。

“把‘复员’做成‘复原’的，是近日过柳回桂的儿童教养院。许多被院

方指定为‘成人’的小孩儿，发给了2000元作回乡遣散费。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亲人在哪里呢？他们全不晓得。去找职业吗？一则是没有熟人，没有社会关系。再则小孩儿能做些什么工作呢？他们拿了2000元离开了院，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复原’为一个难童。因为柳州的美空军‘复原’弄得几千名依靠该基地吃饭的我国工人也‘复原’了。他们多数是外地人，没有任何生活的凭藉。机场小工李一中因生活无着跳江自杀，警察把他救起来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广东军管区补充团的一个排长，因病被部队遗弃才到机场去做了小工。

“近日柳州市郊乡间拉夫的风气很盛，都是武装部队所干的，舆论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痛加抨击，听说专署已派武装队伍分别巡视，地方上的自卫队也自己来武装巡查了。抗战‘胜利’了，战争结束了，竟有人以为是神的力量，日前东大路上有人巨资打‘平安醮’，请道士来敲钟念经，通宵达旦，当局并不加以阻止。”

兴复后，难民的遣返是个严重问题。11月16日该报有柳州通讯说：“滞留柳州难胞共7000多人，都因交通工具没法走不成，其中有5000多是需要救济生活的。交通工具是否真的缺乏？柳江河面上却冻结了几十只船，据说是为了应付‘突然’的军运与‘不时之需’；另一方面有些船只因怕冻结也不敢行走了。”

该报也提到救济总署的工作。10月28日的柳州讯：“善后救济总署原在独山设有黔南办事处，9月初改迁柳州。主持者为高文伯，该处自都匀至柳州一线设有分处6所，工作对象是难民和灾区农民。工作方式分办理难民收容所、粥厂、医药卫生、发放种子耕牛贷款和运输难民等项，工作期间规定为3个月，经费两万万元。但因该处工作无计划性，且人事和会计制度都不健全，因此，使得工作十分零乱，工作效率也不见得高。该处对于各地卫生院经费的拨发也没有一定的原则，单是独山卫生院一处，连药品和经费共发了一万万元之巨。现该独山卫生院院长因手续不清，难于交代，已经逃跑。总之，由于上述种种缺点，真正用到难民和灾区农民身上的款子非常有限，而浪费的物资却实在太多，是善后救济工作目前急待改善的关键。”

9月17日该报刊有《劫后柳州所见》：“疾病滋生——先是痢疾，继以霍

乱，卫生机关药品奇缺，得病人只好听候命运安排，在瓦砾和垃圾堆边，随时可以发现无人过问的死尸。太阳晒久了苍蝇叮满了，臭气四溢，这又是散布病菌的源泉。”

“……战后柳州已不同了，敌人把山上的树木不是砍掉，就是烧光，木料贵得惊人，一片数分厚的旧板需要1万多元，一根直径不到5寸，长度不到两丈的柱子，要2万多元。于是人死装不起棺材，活人盖不起房子。唯一的例外是那专作嫖赌之用的场所——特察里却大兴土木。”

“一到夜里，柳州就被恐怖笼罩，电灯没有恢复，有人叩询电力厂长：何日见光明？回答是频频摇头。”

“夜的柳州除兴仁路菜场的那一段及小南路有夜市外，其余街道黑暗冷清，走夜路有三项危险：人和人相抢，踏着尚未发掘的地雷，被崩裂的危墙倒下压中。偷儿也在暗中活动……”

光复后，内战的阴影笼罩了全国，也笼罩了柳州。12月31日4版有篇题为《内战阴影》的柳州通讯报道：“几千个滞留在柳州市区的难民，全在死亡线上挣扎，期待着回故乡去的船只。然而，许多船只被封起来了，许多被用来运载美国的钢炮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谣言像长了翅膀似的到处传播着，人们十分清楚，在这些谣言里，包藏着一个险恶的阴谋，他们想利用这些谣言来做‘清乡’的藉口，以便实行捉人的勾当。”

“清乡从11月10日就开始了，11月22日中午，8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突然在小南路上被拉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满街的老百姓都眼巴巴地望着，在街头巷尾，他们在交头接耳：‘这是怎么一回事’。”

“柳州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街上抢案时起。白天，街道上的‘守望哨’已增为双岗；入夜，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道上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岗。‘口令’到处听到。每条街的‘冬防班’奉命组织起来，每到天黑时，街民就得轮流背着土枪或大刀，提着‘冬防班’的红字灯笼，举着白旗，五六人一队的到街道与市郊衔接的地方守着，警备司令部已于上月底奉令办理结束，最近又成立了一个‘军警督察处’，该处第一件要务是宣布今后旅客出入市区都要检查。”

“恐怖不能压抑柳州民众声音，县府‘清乡’要各户实行五户联保，民众

却以大家居住的流动性太大，谁也不能担负那些无中生有的冤枉责任而加以拒绝。”“11月12日晚上，在省立柳州中学的大礼堂里，聚集着近千青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音乐晚会，第一个节目是‘胜利带来了一切’，它告诉人们，胜利带来了什么，它坚决呐喊：‘胜利不能再带来战争’，博得了热烈鼓掌和欢呼。其次是‘民主颂’、‘春到人间’等，都得掌声。最后节目是‘民主是那样’、‘警告假民主之名做破坏民主之实的家伙’。”

1988年10月20日

柳州复华旅社

——中统在柳潜伏小组的掩护机构

王仁德

1936年作者在苏州筹建“吴县侨民国术研究社”时，陆树珊以吴县县党部特派员身份来会指导。其后，因武汉形势紧张，三镇行政人员及居民纷纷南下，我处在饥寒交迫之际，又遇到了陆树珊。当时他需要佣人，而我正要离开武汉谋生，便随他乘快利轮船，经岳阳到达长沙，转至衡阳罗家大屋，这是中统局本部临时办公地点。

陆树珊出生于1905年，江苏常熟人，是中统老牌特务。他带我在衡阳罗家大屋住时，还认识了梁辅成、徐政、陈庆斋、王国栋等中统特务。

1937年12月中统局派陆树珊潜赴福建厦门担任潜伏组长，郎小姐（苏州人，原是恋人，后成夫妇）和我当他助手。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准备从湛江绕道至厦门。不料在衡阳车站，陆树珊与王国栋（运转科的人）发生争执，抓住中统实际人事支配权的梁辅成，早就看不惯陆树珊的傲慢态度，立即改派他到广西柳州，不去厦门，扣下应当领的特务经费，只发到柳的经费。任务仍是在柳州建立特务小组。到柳州后，陆的计划是：

①寻找潜伏掩护。掩护职业须是服务行业，接触广，消息灵通。②要在1939年夏季完成外围掩护组织。③发展特务组织。④向重庆中统局联系（通过柳州交通罗维新——中共叛徒上传下达，不久，他调贵阳）

陆树珊人肥高大，西装革履，以逃难大商家身份，在庆云路（中山中路）118号找到一家同德旅社招顶。同德老板名叫朗庆松，当过教师，又是基督教徒。陆冒充教友，因此得以顺利协商成交，改名为复华旅社。他自任经理，郎小姐管帐，我是服务员。同时留用同德帐房钟鼎充当业务，并报重庆中统局备案。

1938年二三月，他自称是江苏逃难青年，参加高天骥、乐嗣炳、董咸熙、陈雄子所组织的“柳州文协”和“救亡歌咏队”，当文协选举组织负责人时，

他与空军政治部主任要来参加投票，但当时因被发觉，未开票而结束。以后，高、董、陈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开会时又碰见了，一般身份的人这个会是不能参加的。

陆树珊为人表面随和，经柳州日报记者查仲轩的介绍，他就经常到柳州日报社坐谈。报社内的编辑记者他都混熟了，各人都叫他做“陆胖”。

在柳州日报社认识记者刘雄后，他了解到刘在河南岸靠近山边岩洞有间茅屋，就把老婆带到刘雄家住了一个多星期，晚上总想找刘聊天。刘认为他既是商人，自己不懂生意经，不愿与他多谈。

原柳州日报社长董咸熙离职后，由林继茂接任，刘雄再到柳报工作，当刘碰到他时就说：“陆胖子，久违了”！后来林继茂对刘说：“陆是中统特派员，你怎么这样大胆叫他做胖子？”这时，刘才醒悟，他屈驾光临茅舍，是有作用的。

陆树珊生活腐化，性情粗暴，克扣工资，作者长期受其欺压。就是他妻子郎小姐也不例外。他的身份暴露以后，就公开以特派员身份出现活动，在罗池路×号×庐买了一间房子把他老婆锁在楼上，据说是疯了。作者也于1940年春夏间跟随中统专员梁天华去贵阳。

《柳州日报》社长林继茂被柳州警备司令部逮捕，柳州警备司令是尹承纲。林继茂是林虎的侄孙，尹承纲又是林虎过去的部下。林继茂得林虎保释出来，对刘雄说：逮捕他是陆树珊干的，陆和钟可庄（军统人员）问过他几次话。

后来陆树珊调到铁路担任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柳州沦陷后不知去向。1945年光复后铁路调统室主任是鹿茂堂。

（本文经蒋霖核实了解有关人员修改补充）

龙虎关实战纪实

此篇回忆为秦永固、魏清议、马志武合作的。秦系当时教官，魏系当时中队区队长，马系当时回族中队学生。关于作战经过，十九期学生马志武同学由开始直至战斗结束都亲身经历，情况详述于后，请参阅作战汇报。

1944年5月中旬正值明媚的仲夏，火热的太阳，照耀着设在桂林李家村的桂林军校六分校。这时接军训部命令：六分校全体官兵、学生，立即开赴龙虎关与敌作实战训练。该地是历代兵家常争之地。当时正值九战区与四战区的结合部，若该地无驻军防守，敌可乘虚直入，达到其钳形攻势的战略目的，不但桂林守军的退路被切断，而且可直接威胁柳州。

我校于5月18日由桂林李家村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以十九期七、八队为主经临桂大圩出发；一路以十九期九、十队及练习营为主经阳朔出发，21日到达恭城。总指挥部就设在恭城。当时的总指挥官是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参谋长是教育处长张广君，所有教官全部安排于参谋处任作战参谋、联络参谋及后勤补给军需等职。军医处改作野战医院。

5月22日我总队由恭城向龙虎关挺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23日顺利到达目的地，并完成布防措施。与此同时，总队接总指挥部命令：必须于一周内完成一加强师的防御阵地编成。经过一周之苦战，同学们的双手都磨起了泡，累得精疲力竭了。但是一想起修筑好工事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有效措施时，大家就唱起了我们自编的龙虎关战歌，鼓足力量。

我们在龙虎关上，
我们在龙虎关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那里投降。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

我们终于按期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形成了龙盘虎踞之势。

在完成上述的各项任务后，我们就分组深入群众中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有的同学负责书写抗日标语，并于标语的后下方标明总队代号“丽字部队一总，九、十”字样；有的负责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

根据总队部署，在战斗打响以前，必须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一、肃清汉奸敌特拔掉敌人耳目

我们分突击与按户两种方式进行搜索。所谓突击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侦查及群众的反映，认为可疑性大的并有一定反抗能力的地方进行突击包围搜查，这是强制性的。所谓按户搜索就是配合地方政府人员，像平时检查户口一样，按户进行检查，务必要保持一定的群众关系。在军民间要造成良好的影响。同时在外围已布置好人员，凡是在检查期间企图逃跑的人，一律抓获收审。

在检查第一个突击点时就碰了一个钉子。“你们是哪部分的？”回答是：“桂林美专。”“你们除了画板画笔之外为什么还有手枪与电台？请出示派司。”“你们没有资格检查我们。”回答不但傲慢而且很倔强。大有看不起我们这些无名小卒的意味。（他们哪里知道我们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越硬越要啃的特殊小兵啊）他们既不肯说明来路，又不肯出示派司。“这是我们的防区，我们有权执行任务。那么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无奈改口说：“只有你们驻军的最高长官方可查看我们的派司，这是上级的规定。”“好，那么就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吧。”于是将其一伙人等押至总队部时，才知道他们是军政部调查统计处派遣至龙虎关的特工小组人员。就这样，一场误会很快就解决了。当即退还武器电台。将其释放。

当进行突击第二点时，遇到的情况是当地的群众组织打着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的美名作掩护，设置道场。招来很多不明真相的善男信女参与其间活动。秩序很混乱。在这次突击检查中，仅于密室中抓获敌发报员一员，缴得昭和十五年制日式手枪1支、电台1部。其他协从人员被混入群众中逃跑了。经审讯，得供词如下：该敌特名金谋辉，东北人，系土肥原亲自培训的学生，直属冈村宁茨指挥。他的发报的内容是：“龙虎关地区，约一个师的防御工事。无炮兵。

有 11 个总队 90 个中队的青年军防守，活动很困难。”经审讯后认为所供情况基本属实，即送当地政府关押处置。

二、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根据总指挥部命令：我总队及练习营全体官兵必须阻击日军于龙虎关以外，并给与严重的打击的指示精神，自即日起我总队就分批深入附近的群众，帮助他们实行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牲口、老弱妇孺，都疏散到山区安全地带，并把有劳动力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做支前工作……这样一来既保护了群众的安全，又利于我们的战斗行动。

三、扫清射界

在预定的阵地前沿一带，扫清一切射界，以利达到消灭敢于来犯之敌的目的。发动群众和我们一道破坏由龙虎关以东周围百里内的公路桥梁，并在主要隘口设置路障，埋设地雷，以迟滞日军的进攻行动。从而在完成逐段破路与敌节节纠缠的目的。完成上述工作后，根据群众反映，向我逼近的日军，不但山野炮不能接近我阵地，就连重机枪迫击炮都改用骡马驮载迟滞地前进。

四、激战开始

1944 年 6 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我便衣侦察人员的情报：“集结于江华、道渠、永明之敌，约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龙虎关方向逐段搜索地涌来。……”情况来得突然又紧急。

前敌指挥部即下达命令：第八、第十中队进入龙山一带阵地；第七、第九中队进入虎山一带阵地；练习营进入关口正面两侧主峰一带阵地。待敌深入时，一股而歼灭之。

各部队于 6 月 19 日接到命令后，即按指定地点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同学们都磨拳擦掌地准备着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与此同时即派出一个区队的兵力进入阵地前沿预想敌人必经之处，组成坟墓式的暗堡，形成一个袋形的伏击圈，待敌进入伏击火网时，予以沉重的打击。布置完毕后不久，果不出所料，日军的一支骑兵搜索队出现了。像群饿狼似的挥舞着战刀，逼近我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学们在暗堡里全神贯注盯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敌人进入有效伏击火网时，区队长一声令下：“打”！暗堡里的机枪立刻怒吼起来。同时所有步枪手榴弹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与鬼子骑兵猛烈的打击。这时鬼子骑士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样本可发挥着骑兵固有优势的开阔地形里会有埋伏。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人仰马翻乱作一团。鬼子军官挥舞着战刀哇哇乱叫地指挥着残兵败将进行顽抗。我们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向区队长建议，区队长断然采纳了同学们的意见，当即命令集中火力先消灭敌指挥官。鬼子骑兵失掉了指挥，都纷纷调转马头，边打边退。这时我前敌指挥所在主峰上已观察到前沿阵地已胜利地完成了触角性的阻击任务，当即命令重机枪迫击炮以火力掩护着前沿阵地上的同学们安全撤回主阵地。

翌日拂晓，鬼子以一个营的兵力，团团围住了我们已撤走了的坟墓式的暗堡群并集中所有的轻重武器向该地区狂轰乱打，企图先拔掉我前沿据点，以利其大部队的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瞎打乱轰后，见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天已大亮了。敌指挥官一看，除了昨日所遗下的鬼子骑兵尸体及死伤的战马外，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这时敌人才知道上了大当。就这样敌人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同时也给我主阵地发出了紧急警报，从而赢得了主动。据前敌指挥所的观察判断，敌人约一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主阵地逼近。停滞于湘境的粗石江彼岸，看布阵是企图采取两翼包围，中央突破。所以将重兵散布于关口正面一带，我们的对策是利用坚固的工事及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实行阵地上的运动战。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地阻歼敌人的进攻。

观此形势预想敌人一定企图首先强渡抢攻我突出的滩头阵地，我们只有利用夜间作业，加固工事及阵地前沿的鹿砦并在浅水暗桩中增设土水雷，在梯恩梯黄色炸药中装上雷管及导火线，一旦敌人接近时，在暗堡中将起爆机一按即可爆炸。不出所料，在当天中午，鬼子的30多艘橡皮艇在其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我正面的滩头阵地反复3次的强渡猛攻。当10余艘橡皮艇接近我暗桩时，都给我预设的土水雷炸得人仰艇翻，剩余10余艘，直至日暮时才退了回去。晚间只是断断续续的枪声在两崖对峙着，敌人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次日拂晓，发现鬼子在一夜之间集中全力将附近的民房全部拆光，将其木料扎成100多张木排。敌人除了少数习水性的工兵支撑外，其余都是些旱鸭子，每只木排上都架着机枪与小炮，在其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从彼岸向我沿河滩头

阵地再渡进攻。待其木排进至江心时，我主阵地火力才进行猛烈的反击。打得敌人木排在江心中团团乱转，不知所措。有的被炮弹和水雷炸翻跌入江中、以饱鱼腹，敌人虽用尽了所有的优势火力向我左右及正面反复的轮番攻击，结果都被我军打得伤亡惨重，狼狈地退了回去。虽然我主阵地在敌人集中火力轰击下，有许多工事被震垮，部份交通壕被炸平了，少数同学挂了彩，然而我主阵地巍然屹立，固若金汤。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两天来敌人遭遇了反复惨败，再也不敢冒然的进攻了。因而双方仍保持着以火力对峙着战斗。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孤军无援，但是我军已胜利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我们的阻击任务。

总指挥部据此情况，于当日下午（21日）即派来9架战斗机，首先是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了3周，表示要求我军指示敌我之明确位置以利其战斗。当时我军的通讯设备较差，不但没有对空联络的报话机，就连最简单的对空联络布版都没有。同学们就将自己的白衬衣铺在地上作布版，指示敌我位置。于是我空军分3组在敌占区上空轮番扫射轰炸，打得鬼子军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我前敌指挥所接到总指挥部命令，星夜撤退，并将剩余的枪支弹药，军需补给等配合支前民工运至龙围山区。留练习营一部官兵配合当地的游击队组织，建立敌后根据地，与敌长期周旋。完成任务后我部由龙围经恭城向平乐方向转进。到平乐后才交给四战区张发奎部的九十三军接了防。少数挂彩的同学也逐渐康复了。大家愉快地接受新的训练任务。

抗日初期柳州日报的片断回忆

刘 雄

30年代初，柳州曾经出版过一份柳江日报。其社址设在东门大街口对面（现在罗池路教育幼儿园），省立四中教师胡行健曾在该报任编辑。当时的外勤记者叫采访员。那时我任屏山镇镇长，他们曾向我进行采访，因此这个称呼我记得很清楚。至于该报何时何故停刊，我则不甚了解。

1936年杨恩震、蒋必舞二人创办一张四开版《柳州三日刊》，他们没有什么组织目的和政治背景，只是凭一股对文艺事业的爱好热情搞起来的。他们创办时，无社址、无经费、无职工、无工场、无政治后台，他们两人自己写稿，自己编辑好之后，委托柳州独一无二的生盛昌印务局承印。如此新闻机构，势难长存，更难有发展的希望，它大约出了10多期就寿终正寝了。

同年尾，驻防柳州的最高军事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军长廖磊，嘱其政训处处长胡学林和柳江县长杨盟，与杨、蒋二人洽商，结果把杨、蒋二人创办的《柳州三日刊》接收过来，改为《柳州日报》。改组后的社址设在福建会馆（现在的柳州剧场）。第一任社长是柳江县县长杨盟，总编辑是胡学林，副总编辑是省立四中校长潘振，他们都是挂个空名——兼职的，负责实际编辑工作的是梁琴生。梁是梧州人，曾在香港办过报，为人谨慎，工作认真，学识渊博，办报经验丰富，卢仲德、蒋必舞任记者，李经伦任经理，杨宇中任营业员，黄××任庶务，司徒安任机房领班，林绍初任字房领班，报纸的电讯消息由第七军电台供稿，全社职工二三十人，全报社经费由七军与柳江县政府津贴。

报社成立不久，第七军军部缉获两大卡车走私的鸦片烟土，军长下令将烟土及卡车一概充公拍卖，所得的款，一部分作为建筑体育场演讲台及围墙（现在的市府大院），其余交柳州日报社作为基金。

1937年2月，经理李经伦、记者卢仲德、蒋必舞先后去职，刘雄、吴刚、

查仲轩充任记者，杨宇中调升经理。不久吴刚脱离报社，他走前介绍廖大光继任，梁琴生介绍彭树椿任助理编辑。

以前杨、蒋二人创办的三日刊，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其所刊出的内容，大体是一些新的诗歌和短小的散文，很少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文章，三日刊改为柳州日报后，便成为柳州军政机关的喉舌，各机关上呈下达的文件，经改头换面后就作为新闻发表。

第七军是属于李、白精心经营的一支部队，在北伐时，号称钢军。1929年李、白与蒋介石军事集团因不可告人的事而发生兵戎相见，当时蒋处于优势，好在李、白有廖磊助予一臂之力才得逃回广西，重新收集残部，于是第四集团军这招牌在南宁又挂了起来，而蒋受其它势力牵制，对李、白不得不让一步，暂时听之任之。李、白也懂得有朝一日蒋介石总会把这眼中钉——广西的李、白除掉，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作为重整旗鼓的奋斗目标，其具体的做法是实行“三自三寓”政策。行新政用新人等来壮大自己，用以防范蒋介石剪除异己的阴谋诡计，广西所有报刊当然成为李、白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宣传工具。但当时，特别是“九一八”起，抗日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双十二”事件起，抗日呼声更进了一层。广西的报刊，除了宣传抗日的内容，不管李、白抗日诚心的分量有多少，而广西报刊宣传抗日却是事实的存在，柳州三日刊改为柳州日报后，成为李、白军事集团的有力喉舌，而不再是三日刊那样的性质了。

“双十二”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兵谏的方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事件，此事件一起，全国抗日呼声便高入云霄。蒋介石为此形势所逼，不得不改弦更张，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老少，一致投入抗日阵线中去。《柳州日报》也成为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报刊。由于形势需要，报纸的销路与日俱增，区属各县纷纷来函订购，不但报费收入日增，广告费收入也大有可观，可以说完全达到以报养报的境地。由于报纸销量大增，各方面也不得不随之扩展。这时报社已自设电台聘请电务人员，专收国内外通讯社所发的电稿如中央社、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等发出的消息都一概接收后分别选取录用。

“七七”抗日烽火燃烧后，第七军离柳北上抗日，杨盟县长离职，其社长兼职交由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兼任。高接社长后，报社人事有些变动，陈秉生任经理，曾纪华任营业主任，胡学林兼总编的职务交由第七军留守处处长马典符兼任。

1938年，日机疯狂普遍轰炸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柳州也在日机轰炸之列，七八月间大批日机袭柳，从东边的牛皮厂码头起，沿更新亭、北较场、一路塘、西门等都遭日机轮番轰炸。平民遭受死伤均有数百人之多。柳州日报社工场正中一弹，字房遭毁，字颗变成了弹片，送报工人吴四罹难，全社职工因之人心惶惶，因此报社想方设法把工场迁到郊外盐冲口（现在的市委旁），搭建临时工场。而编辑、采访两部仍在市区，但敌机夜以继日轮番来袭，全市实行灯火管制，工场仍未能工作，搬迁等于不搬，因之又再考虑二次搬迁。高天骥社长决定迁鹧鸪江。那里离市区不远不近，大家认为相当理想，有一栋私人榨糖用的瓦房可容纳编辑部及电台、印刷工场之用。至于采访和经理部仍留在市区。鹧鸪江与市区相去10多里，采访得的稿件及广告在当天下午送到编辑部，明日即可刊出。如下午4时以后才送达的稿件和广告，只好顺延一日，因此，发行受交通影响和延误，报纸销路急剧下降。且报社同仁的日常生活也感到不便，如有病就医更难，编辑梁琴生就是患病未得及时诊治而丧生。经过几度搬迁，职工精疲力竭，报纸销路下降，社长高天骥因此辞职，遗社长一职由马典符继任。马接任后，人员变动很大，查仲轩任经理，陆苍夫任主任编辑，由彭树椿介绍吴越任记者，刘雄调充编辑，又将工场由鹧鸪江迁回马鞍山半山腰的大岩洞。这时正是日寇二次进攻南宁，昆仑关敌我混战，四战区下令柳州疏散，报社又将字房印刷机搬下山脚，装箱下船，准备疏散长安（现融安），后来接前线电报，昆仑关敌被我击溃，于是又从船上将装箱的机器字颗起岸，又在山脚抢盖一间临时工场，这时才稍安定下来。

自武汉、广州失守后，白报纸来源短缺，不得不采用土报纸印刷，加之字颗老化，无法补充，印出来的报纸模糊不清，销量又一度下降，广告费收入也同时锐减。四战区《阵中日报》又出版竞争。《柳州日报》大有摇摇欲坠之势。马典符辞社长职，由专员公署秘书陆雁峰继任，经理查仲轩离开柳报，我被调

到抗日动员委员会任秘书。我未接到通知前就自动离职回家。我离柳报后，陆雁峰被免职，董咸熙以广西省党部驻柳特派员身份接陆雁峰任社长。此时总编辑由彭树椿担任，曾敏之任采访主任。

1938年尹承纲接任柳州行政督察专员，他正式委派林继茂为柳州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又兼伤兵之友社总干事。同年5月林亲到我家邀我回柳州日报社工作，并说尹专员也有这样希望，因此我不得不再作冯妇。我第二次回到报社接替曾敏之的采访主任，曾改任副刊编辑。不久，报社突然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副刊文章中出现把汽车司机称为车夫称谓，一大批司机来报社闹事，他们将柳州日报社招牌打落下地，声言要找编辑记者问罪。当时得到汽车工会调停，一场闹事风波才告平息。

林继茂任社长时，得尹承纲大力支持，《柳州日报》由四开版改为对开版，此外还增加一个四开版的柳州晚报，晚报经费来自柳州商会。其内容大部分是报道当天的商业行情和经济动态，也有战讯和省市新闻。晚报编辑是谢落生，杨××任记者。他们两人工资是由商会支付。《柳州日报》由四开改为对开，当然人员不得不增加，总编辑由林继茂兼任，李文颢、曾敏之、彭树椿任编辑，刘雄、雷蕾、赖贵安、张焕宁、吴越任记者；武汉、广州失守后，许多新闻工作者如潮水一般向桂柳涌来，柳州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外埠大报均派有驻柳人员，陈凡是大公报驻柳特派员，侯本珍是扫荡报驻柳记者，王平是力报驻柳记者，张兆汉是广西日报驻柳记者。当时在柳先后出版的报纸有：《中正》《阵中》《前锋》《立言》《立鱼峰》等报。各报都有其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代表着各种势力。但总的来说，打着宣传团结抗战的旗帜方面则是一致的。

柳州日报改版以来，编辑与工场都是分开的，工场在马鞍山脚，编辑部仍在福建会馆。那时已有新闻检查所，配属于四战区政治部，所长是赖振家，他挂中校衔。新闻检查所之成立，给各报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如省市新闻和特写、社论等，必须送检，其内容涉及民主二字的文章，必然遭扣留。我们的对策则留着版面空格。编者术语叫做开天窗。

《柳州日报》工场与编辑部长期隔离，对工作有许多不便，但是也无法解决，最后我建议尹承纲（尹是兼伤兵之友社理事长）将伤兵之友社在银行的存

款用来建伤兵之友社社址，（当时我是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兼伤兵之友社总干事）尹十分赞同，我将所存的款尽数取出，在河南白虎庙空地（即现在驾鹤办事处）建造一栋前面两层楼房、后面三排平房的房子，报社占三分之二、伤友社占三分之一。自此报社才有固定社址。

报社迁入新址不久，林社长聘罗培元任编辑主任，张琛、邓帮俊、陈平伯、吴启燕等任编辑，采访部增添了温流、朱宗、胡清涛、李文等记者。后来林继茂因事被捕，遭社长一职由专署助理秘书黄炎桑继任，罗培元调任总编辑，张琛为编辑主任，关伯安任编辑，刘雄调任经理，吴启燕接采访主任，不久黄炎桑去职，社长由罗培元接任。

1944年日寇陷柳州，我离报社到民团指挥部工作。柳州日报社迁罗城县的龙岸乡，日寇投降后，柳州日报返柳，社址设在东门城楼。不久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罗培元任社长。

关于柳州邮政贪污案的补充资料

陈佚生 整理

《柳州文史资料》第四辑有一篇苏德润先生遗稿《柳州邮政的开始及抗战末期邮政贪污案》。现据《新华日报》对此案的报道作如下补充，以供参考。

民国三十三年(1944)8月12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柳州7月30日的通讯：柳市邮局包裹组长朱宝藩在6月24日因奉命疏散，停止接收邮包时，违令续收5天的包裹几千件，并将收邮日期涂改为23日。经各方检举人查明，曾经在26日由海关签发单据的1868件，27日25件，其余没有报关的还很多。该局现将朱停职查办，并派监察视察员各一人彻查，省局长曾玉明会同总局视察员到柳视察，今午招待记者，报告进行情况。本市各报对这个案子连日都有文字刊载，并发表该局临时差员黄文俊曾受主使，勒加运资每件百元，由部内人员按数分摊的黑幕。各方对这事都盼望严予法办，以阻止贪污的风气。

9月13日，《新华日报》在报道柳州的消息时，又提到了这宗“最引人注目的邮局包裹舞弊案”说：8月15日，本市各报都接到了署名“柳州邮局同人”的信，对于其中黑幕揭露得很详细。其中还指出：在幕后有某某等许多人替这案子撑腰、包庇、纵容，又说某某奔走最力，腰怀手枪，对揭发案件人采取个别谈话方式，威胁利诱，无所不至，并声言不惜以小冲突演变为大流血。因此包裹组长朱宝藩竟借故避见，由别人居间传达消息，一再延宕缴检关单和收寄详情单。总计共非法收了包裹费126万元，许多贪污情形，在柳州邮局已成公开秘密。邮局同人的信中，希望对有关人员——严办。接着，却在报上来了一个启事，用“真柳州邮局同人”的名义加以否认。但是真是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9月19日，《新华日报》又在二版发了一则“中央社8月30日电”谈及朱宝藩案：朱案经各方检举后邮局当将朱送地方法院讯办，经法院侦查认定，朱是公务员，已转送军法执行监法办。又邮佐张九龄、局差黄文俊、李俊杰联

同舞弊，各摊有巨额现款，近来因案情揭发，畏罪潜逃无踪，邮局已写信给治安当局追缉归案究办。

至于柳州邮政贪污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此后，《新华日报》也没有再报道这一案件，望知情者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柳州青年学生抗议美军暴行

——“沈崇事件”在柳引起的波澜

柯 阳

1946年春，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十协定”，破坏和谈，美国军队占驻我国的北平、天津和秦皇岛一带，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全面内战，大量的美军拥进我国领土，并四处横行霸道。12月24日晚，美国士兵在北平东单练兵场侮辱北大女学生沈崇，激起了北平、武汉、天津、上海、南京、广州、西安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青年学生的义愤，他们以游行、罢课、示威来抗议美军制造的“沈崇事件”，申讨美军暴行。

北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的一封封抗议通电抗议书，像熊熊的怒火在全国各地燃烧。清华、北大、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张张宣言、传单像黄河、长江的怒涛向全国各地奔流。

柳州中学（后改为柳州高中）学生自治会收到这些通电宣言、传单后，大家都燃起了满腔怒火。在教室、在球场、在新桥的走道上，三五成群的同学在议论着。在各地的通电宣言中，革命和进步的报刊杂志中，号召所有的全国大学生，一致起来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争取实现和平民主。

柳州如何搞呢？柳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梧裕茂同学，在一天夜里找到中共柳州地下党的岑友鲲汇报和请示。

柳州地下党领导机关经过研究后通过岑友鲲给我们提出了方案，作了具体部署：（一）由柳中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柳州各中学的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抗暴具体事宜；（二）在联席会议上具体提出组织成立“柳州学生联合会”（简称柳州学联）；（三）学联今后的工作活动及方向，先行秘密组成建立，后公开出面开展活动，以合法组织名义，开展合法斗争；（四）在柳州各中学学校内，召开中小型会，声讨美军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五）

以柳州各中学(学联)发印通电、宣言、传单至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声援北大,抗议美军暴行。

在一个寒风袭人的冬夜,在寂黑宁静的柳中礼堂里,柳州各中学的学生代表围坐在煤油灯下,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柳中学治会主席梧裕茂主持,我(当时叫柯国雄)作记录。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代表谢光泽、柳江县立中学(现市二中)、柳庆师范(现柳州师范)、中正中学、龙城中学也派来了代表,大道中学因在鹧鸪江,路远,又是晚上,代表没有到会。

会议按照中共柳州地下党的部署,由柳中代表首先提出组织柳州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先由各中等学校组成后,逐步扩大到各小学的教师。

建议被会议一致通过,同时选举柳中梧裕茂为学联主席,柳州高工谢光泽为副主席,其余学校代表为委员。由柳中梧裕茂同学宣读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给柳州中学抗议美军暴行的通电宣言。当场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一致表示要声援、要抗议。最后一致通过以各学校联名发通电宣言响应抗议美军暴行。

当时,各学校同学正在忙期考。同时我们已知悉国民党反动派已布置了一些宪兵、特务化装到各学校监视进步同学。为安全起见,暂不搞大型声讨会及罢课游行,只在各学校内召开小型座谈会,宣传声讨美军暴行并由柳州各中学联合印发通电宣言至全国。会议决定:印通电宣言的经费,由各学校学治会会费中提部分开支,先由柳中学治会会费中垫支。会议还就如何分发送出传单等问题,作了研究,直到夜深人静的凌晨12点才散会。

柳中礼堂的联席会议后,我们察觉国民党已派出一批特务在监视青年学生的活动,四处打听我们到哪里去印传单和通电宣言,说明有人泄密。一天,在东台路上,中正中学那两位代表向我打听宣言传单在哪里印,引起我的警觉,便回答说:“派人到桂林去印了。”

又是一个寒风袭人的夜里,我和梧裕茂2人,漫步在中山东路上,当我们走到国民党专署(现中山东路52号大院)门口不远时,便看到一个矮肥中等身材的人,从联华印刷厂(现中山东路28号)走了出来,我们抢快走两步,便和这个人接头。这人就是联华印刷厂的经理、地下党员岑友鲲。梧裕茂同学马上

把草拟的宣言传单草稿交给他，岑友鲲迅速接过又望望路的两头，低声说：“一星期后来取。”随后我们便马上分开走了。

联华印刷厂是中共柳州地下党以公开合法身份办的。我们的宣言稿子修改得简明有力后送去，他们很快地连夜组织拣字排版，岑友鲲也亲自踩机印刷。

我们付印的宣言传单内容，主要是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北大的罢课正义行动，反对内战、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和平！宣言约 700 字，最后是以柳州中学、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柳江县立中学、龙城中学等学治会署名。

这批传单，因数量大，我们由 3 批人分 3 次用麻袋去取回，分藏在城内可靠民家。

由于已是严冬，各学校都已放寒假，从县里来的同学，都先后回了家，散发传单的工作多由住在柳州的同学来负责。其中大部分是由柳中的同学用麻袋取回后即用邮寄出，部分分给柳州高工、柳江县中、龙城中学的学治会发出。按计划，是先发外地各省市大中学校，后发省内各县大中小学，最后才在柳州城内各单位机关学校发，发信时应通过各学校的同学，以寄信给同学的名义——某同学收，不写发出地址。有一部分附近县份如武宣、柳城、来宾，给人带去交给同学发；也有一部分送到桂林通过西大、桂中的同学发。

柳州各中学联合印发的传单，一份份送往各地，同时我们也收到各地大中学校发来的通电、传单，表示在声讨美军暴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心心相印，互相支持。

柳州“立法委员”竞选见闻

杨育晞

1947年初，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一方面向解放区大肆举行军事进攻，把内战推向高潮；一方面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着手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施展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国民党实行所谓宪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立”。实施立法权的机构是立法院，从名义上说，凡属国家重大法规均得由它制定或通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当时的《选举法》规定，100万人口产生一名“立法委员”（以下简称“立委”）。1947年冬广西“立委”选举工作开始进行。那时全省人口1500万，另外还从教育团体和妇女界单独各选一名，全省共可选17名。为了平衡分配，将全省分为三个选区，桂林、平乐、柳州三个地区人口共约500万，划作一片，是为第一选区。

柳州（那时是柳江县）及其附近几个县产生一名“立委”。尽管“立委”不过是点缀品，但却是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地位颇有点像美国的参议员那么显赫，每月可拿几乎相当两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另有“车马费”等各项津贴，再加上随着“立委”这衔头而来的种种说不完的好处。如此美差，实在令那班当官当腻了的权势人物垂涎三尺。

柳州本地有本事敢为夺取“立委”一争高低的，仅张任民和覃连芳2人而已；另有些人也想，只不过是“狗吃月亮——差得远”。张任民参加“立委”竞选前是广西省保安副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向来是李、白、黄的亲信。覃连芳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军长和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团长，上将军衔。覃连芳早就与李、白、黄有芥蒂，终至反目。蒋介石曾笼络他，并利用他分化桂系，但没有成功，后来见他用处不大，也就不理他了。他不甘寂寞，于是乘“行宪”之机，弃国民党而向民社党靠拢，企图另辟蹊径，东山再起。两相比较，张任

民属当权派，有国民党和李、白、黄的支持，省政府私下给他送大笔“竞选费”，显然占着优势。覃连芳明知取胜不易，但自恃有“民主政党”的支持，名声似乎比国民党好听些，同时在地方上有一批可供他指使的大小实力人物，凭借这些，可以搏一搏。

我父亲杨义 1947 年秋甫卸任柳江县长就赶上“立委”竞选。杨家同张家是至亲，张任民的母亲是杨义的亲姑妈。两家常来常往，张任民公余回柳常来我家向舅妈（我的祖母）请安，杨义在政治上也得过这位表哥的关照。我们家同覃连芳也是亲戚，我外祖父的姑妈是覃的祖母。覃与其原配夫人仅生一子，名德庆，钟爱非常。我叫德庆为德德表哥，因为年纪差不多，儿时常在一起玩。抗战初期，德庆患“白喉”不治夭折，覃连芳夫妇悲痛难以名状。抗战胜利后我们同覃家便疏远了。覃连芳偶尔也上街溜达，蓄一撮“仁丹”胡子，足蹬马靴，牵着一头大狼狗，大摇大摆，板着个脸，旁若无人。尽管大家都是亲戚，可是我并不知道覃连芳与张任民以及我父亲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和矛盾；但看见覃连芳那副臭派头，本能上我就讨厌他，遇到这位表舅爹，老远我就走过一边，懒得同他打招呼。

张任民参加竞选之始，就邀杨义、县参议会议长、父亲的知交刘克初等共商助选事宜。杨、刘又串联了唐纪、陈如平、龙孝坚、王剑功、董咸熙、高天骥、翁振翼等地方知名人士。他们常在张家或我家聚会，还分头在柳州城乡和到附近的一些县，请当地的当权人物和相信得过的人士吃饭、开会，布置他们帮拉选票。为帮表哥拉票父亲成天东奔西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面，家里来的客人也多于平日，比他当县长时还忙。

那时我家住古香东路（今曙光东路）。这条街的街长姓黄，名字已记不起，老百姓背后叫他黄老虎。此人个子矮，年纪 40 上下，一脸横肉，好像还有几颗麻子，是个沙喉咙。他这黄老虎的外号是得自于他的长相，还是因为他平日鱼肉百姓，欺凌善良，就不得而知了。投票选举前不久，竞选进入白热化，各自拥戴张、覃的红绿标语贴满街市，还出现了一些互相攻讦、揭丑的“白头贴”（类似“文革”时不署名的“小字报”），人们感兴趣的还是这些比黄色小报的“花边新闻”更“精彩”的“白头贴”，围观如堵。一天，父亲把黄老虎请了来，

把我也叫了去，当面拿出一大叠张任民的名片，叫黄老虎陪我去本街动员选民投张的票。这事可叫我为了难。要知道，那时我只不过是个懂事不多的初中学生而已，平日唯一关心的是学好数、理、化，对“选举”这类闹剧根本不感兴趣；再说人家见我这“娃仔头”的样子会理我吗？父亲见我面有难色便说：“没有什么的。你就把名片交给各家的大人们，请他们选你二表伯，有什么难处还有黄街长嘛！”虽然不情愿，父命难违，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黄老虎领着我，先走古香东路，再经梳子街（今曙光东路南三巷）折回来，挨家挨户找当家的成人。无论是谁，我都毕恭毕敬地双手送上一张名片，请他们投张任民先生一票，再多的话我就不会说了。黄老虎到底是个街长，看人说话：见是大户人家就点头哈腰，笑容可掬；到小户人家便换了一副面孔，指指点点地说：“记得了吗？到选举那天，你们就照着这上头（指名片）的名字打圈圈，莫圈错了啦！”受我们拜访的街坊邻里，许多人神情漠然，喃喃以对，实在看不出他们在此次选举的热情何在。事前事后我都没有问过父亲：为什么让我同黄老虎一道去送名片？我猜想大概是要借助街长这“地头蛇”的作用，但又对这位老兄是否老实感到不大放心，只好把我这“娃娃兵”也派去临阵监督吧。

开票结果不出多数人所料，张任民当选，覃连芳落选。过了几天，一位本家叔叔兴冲冲地跑来我家，悄悄告诉我们一桩“秘密”。旧社会兴讲“同姓一家亲”，我伯父杨蓬倡乐于此道，同柳州及附近一些有点名堂的杨姓人家都认了“本家”，称兄道弟，有事相帮。当初伯父办娱乐戏院（今人民电影院），照顾这位本家叔叔在戏院门口最当众的地点摆了个水果摊，后来又让他在戏院里当“带位”（相当现在的服务员）；我父亲当县长时，又让他在柳西镇镇公所当了个办事员。那时柳州城区对河两岸划为柳东镇、柳西镇和屏山镇，各设镇公所和镇长，街道设街长。“立委”选举投票结束那天，说是时间已晚，到第二天才开票。便当众将票箱加锁贴封条，分别集中到各镇公所，派专人通宵看守。本家叔叔讲的“秘密”就发生在那天晚上。他是“选举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看守”保存在柳西镇的票箱。他伙同其他“工作人员”连夜把因没来投票而封存的空白选票搞出来，通通在张任民名字头上打圈，再全数塞进票箱。这套“偷天换日”的把戏讲得起劲的时候，本家叔叔那绘声绘色、唾沫横飞、

好得意的样子，至今仍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经过这次“立委”选举，使我懂得了不少想象不到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许多，对国民党会改弦易辙的一线希望也彻底幻灭了。

1988 年 11 月 21 日

马平及柳州县易名时间及缘由

梁志强

马平县于何时因何改名为柳州县？柳州县又于何时改名为柳江县？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最近，笔者查阅了当时一些报刊和档案资料，所得结果如下，特提供研究参考。

民国十九（1930）年前，柳州为马平县治。但一般人都习惯将马平县称为柳州；甚至连机关团体来往函电和报刊，也多将马平县称为柳州县。结果，造成了不少混乱。为此，马平县政府不得不于民国十九年冬向广西省政府反映，建议将马平县改称柳州县。理由是“马平原为柳州府之首县，自府制废后，县中各机关法团仍多袭用柳州（这一称谓），且该地本当柳（星）之分野。昔柳宗元治柳，德化犹存，邑中山水曾籍柳渠而附骥名区。故言马平，人或误会，举柳州则鲜有不知。现值训政时期，名称允宜划一，请予改名柳州以一视听而正名实。”广西省政府根据民意，允马平县政府所请，批准“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一月一日为更改县名日期”。从此，马平县即正式改名为柳州县。

但由于当时广西当局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马平县名之变更，纯属广西自行作主，并未呈报中央核准。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过问此事了。3月13日，该部以“零零一四六号”文咨广西省政府：“马平县名是否存在？柳州是否习俗沿用名词？请查明见复。”4月7日，广西省政府以“民字第三十七号”文复内政部，如实告知马平县改名为柳州县之缘由及日期。

次年（1937年）2月20日，柳州县政府接广西省政府“洽（十七日）民代电”称：“奉内政部咨文，柳州县名，州县二字同时并用，与全国各县命名通例不符。飭拟新名三个呈候核转。”柳州县政府遂于2月27日下午3时，召开县务扩大会议讨论拟定新县名。会议由县长杨盟主持，出席者有各方（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民团等）代表梁晓钟、韦遂贤、张一铮、冯异才、鄢扬才、康良生、韦育青、周颐、王仁青、马典符、莫家彦、何佩三、石兆芳、王受祺、

李惠如、周书、翁云衢、陆广森等 18 人。结果拟定①柳江②龙城③潭中 3 个新县名，由县府加注取名意义，呈省核转。经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研究，决议选取第一个（柳江）为新县名。并咨请内政部转呈行政院审定。

同年（1937 年）9 月 23 日，广西省政府以“人字第五〇三一号代（梗）电”通知全省各有关单位：“（衔略）查柳州、龙州两县名称，当经本府委员会决议改为柳江县、龙津县。咨请内政部转呈，经奉行政院核准，并换县印到府。除分别任命杨盟、李天骏继续充任各该县县长，并将印信颁发启用暨另飭知照外，仰各知照，并请查照。省政府主席黄。梗人印。”

资料来源：

- ①《广西省政府公报》第一一八期
- ②《民国二十年来大事记》
- ③柳州地区档案局藏全宗号 43、目号 9、卷号 9
- ④《南宁民国日报》1937 年 3 月 3 日、4 月 12 日
- ⑤《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汇编》
- ⑥《剑光旬刊》

一起官基于匪的强抢豪夺案

梁志强

清末，广西出现了一个跨（贵州）省、专门从事木材生意的集团。它是由旅居桂林的广东客商黄汇昌和江西客商汇裕丰店、旅居柳州的广东客商广和祥和仁兴祥店、旅居长安的广东客商广兴昌和广和昌店、旅居贵州古州厅（属黎平府，民国后改为榕江县）的广东客商怡升恒、吴泰祥、启利祥、隆安和等店铺联合组成（总行设于柳州广和祥店）。该集团资金雄厚（共有资金600余万两白银），在广西龙胜厅（今龙胜县）、全州西延分州（今资源县）、怀远县（今三江县）、融县（今融水、融安县）和贵州古州厅等处自办有山场，每年伐（购）木扎排，顺五排河、桑河、浔河和融江放排至柳州转梧州、广州，垄断了这一带的木材生意，年营业额300余万两白银，出口杉木60余万条。在桂中、桂北商界中首屈一指（仅每年税课一项即达10余万两白银）。为此，招致不少人眼热。

民元（1912年）3月下旬，该店在黔属古州下江厅一带伐大杉木5000余根，运至孖温扎排，准备放运广州。当准备工作行将就绪时，突有一股匪徒窜拢古州下江一带，众商及伙计闻贼将至，争相弃排遁匿逃命。后贼被闻讯赶来的滇军击退，当地文武即垂涎这批木材，决意侵吞。他们先是遣人砍断部分木排索缆，让木头顺水漂流，然后在下游逐一收捡；接着由把总肖德润、地方绅士石灿如、潘泽安、林子儒、赵玉亭、肖春和等出面，声称奉古州镇、道及下江厅罗通判之命，将这批“匪木”没收充公发卖。当怡升恒等店商及排伙重返孖温，已被佞等卖去锯去大木3000余条（值银16000余两）。各商当即据理力争，以每根大木的火烙招牌为凭证，才得回剩余的木头1000余条。至于被卖去和锯去的大木，肖把总等坚持是匪产，不允退赔。该商等不服，据呈广西军政府，请求当局为民作主，帮追回损失。5月，广西军政府以“所失木排系在黔省下江厅等处，业经据呈咨请贵州都督飭行，该地方官秉公查办在案”函复黄汇昌等店，

从此再无下文。

广和祥等店被迫于6月直接上诉国务院，陈述经过，并针对肖把总等所诬之词予以力驳。指出“(本商号)资本雄厚为首屈一指，举国皆知，岂有拥厚资而往穷瘠边疆充当匪徒之理，其谁信之？”“所谓匪木者，岂盗贼由陆而来，乃扛木作军械效揭竿而起耶？大木俱有火烙招牌为凭，岂大股匪徒即木商所用之伙伴筏伏耶？然则伙伴一能化千百万身？”接着，一针见血指出，“直是官绅诬商为匪，方能诬商木为匪木也！锯去卖去之木价值一万六千金，是官为匪劫夺商财也！贼来未抢商木，且未锯未卖，今克复后反被官夺之锯之卖之，是官更甚于匪之恶也！此等官匪何得谓为民国世界？直谓之匪世界可也！”最后表明，“商等愤极冤深，一字一血，沥情上叩国务院钧前”，希望“俯赐电致黔都督，勒令下江文武官绅受用此赃者，如数追赔，以归血本而甦商困施行。”

国务院于7月分别给贵州、广西军政府发电，责令黔、桂当局查处此事，严惩官匪。然而在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官官相护的年代，此等电令，最终只能是一纸空文！参与分赃者始终没有一个退出分文！一场赤裸裸的强抢豪夺案就这样不了了之。黄汇昌、广和祥等商号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倒霉，权当“遇上了豺狼”，白白被咬去一口！

资料来源：

- ①《广西要闻》
- ②《广西公报》第二十四、二十五期
- ③《南风报》第九期
- ④《柳州商会报告》

韩彩凤生平简述

韩少武、韩少芳口述 刘克武整理

韩彩凤字岐山，柳城县上雷乡六马村人，家境贫寒，幼年读过两年私塾，以农为业，兼看鸭帮，逐年生活有所好转。他兄弟3人，长兄彩龙，二哥彩辉。其本人气量大，颇肯助人，柳城县河东乡人民对他很有信任，处处得人欢迎。

民国元年，他在沈鸿英部任哨官，进驻柳州不久升为管带。民国二年，他随沈前往平乐，他清剿辛亥革命后余匪，使该处得以安居。而后，他回柳州提为统领，进驻柳州一段时间。至民国五年，去沈部调往广东清剿龙济光，攻打石城，城破，龙济光溃退，奔往海南岛去。

自从打破石城，赶跑龙济光后，韩彩凤功居首位（沙埔、上雷也有人随去可证），但沈向上司汇报，说是其子沈荣光之功，竟提擢其子为统领。韩见沈以亲循私，赏罚不明，不久便辞职到南宁，将情况汇报给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陆劝慰韩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并派韩到梧州充任第二司令，适至民国九年冬，陆、沈、韩等部均被广东陈炯明打败，赶出梧州。陈率部属占领广西，陆、沈等部，逼上山区。韩则驻扎龙州、庆远等处。

民国十年间，广西战乱，四处皆匪，军、政混乱不堪，散兵游勇，各立部属，各自为政，彼此争夺地盘，收税为粮，以维持军需，更有大小股匪，抢家劫舍，耕牛、粮食被劫一空，每日入夜，鸣角求救，彼落此起，匪风厉害、时有所闻，人民痛苦，不言而喻。

民国十三年，陆荣廷倒台，奔逃上海，此时广西又有韩、沈两部，互相争夺，彼此伺机吞没。当年秋，韩部原驻在东泉、上雷、沙埔一带，沈则在当年农历一月十三日乘韩不备，开兵至东泉螺田村背，进攻韩部，与韩部副司令吕子荣接战，双方战斗甚为激烈，吕被击毙，韩部属惊恐不战，遂退回上雷。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利用联沈攻韩策略，遂出兵向沙塘、风山两地驻扎，意图接近消灭韩部，在当年（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李部派出兵来风山新维

村黄花桥与韩部接触，韩部部将邓定邦接战，邓从牛枫村撤退，其后勤部队由凤山镇退出到沙子桥牛柜山前，在新维村附近双方激战更烈，忽接李部通知说：按前商定：联韩倒沈计划，此次行动实属误会。韩部迅即通知邓定邦后撤。李见韩真的后退，其后勤部队又转回凤山街驻防，接着于18日清晨，李部由凤山出兵绕沙埔大潭小路由古青水尾村涉过河滩，抵达沙埔对河几个高岭即石门山、糞杷岭、鸡公山、狮子山等处占据，企图攻韩。当天（7月18日）中午，韩将邓定邦在沙埔对河天后宫率兵开出，强攻李部，高岭业已攻下，但人马伤亡不少，遂即向长隆乡属烂村败退，直往大埔而去。事后，韩逃往澳门。其兄韩彩龙在宜山战败被俘，后在李部行营中服毒自尽，接着沈鸿英亦被打垮逃往香港。

民国十五年，韩彩凤住澳门时，李宗仁、白崇禧致信韩彩凤劝归，给委予充任广西三融、柳罗县剿匪保安司令，驻长安（今融安县）任事。3个多月后，他已招募得余明健团长人枪一批，罗城县吴渭斌人枪百余，合并其他人枪共为2000多，后委任韩为独立师师长。至民国二十二年，又改编为第七军二十一师师长，跟随廖磊驻百色进行剿匪，后转至二十六年时，被调任为中国抗日救国军三十师师长，驻扎全州候命。

民国二十七年，李宗仁又命韩转返柳城县，剿匪招安，驻扎在太平乡，常往匪窝四十八弄招安匪首周老德与其他匪首出来自新，不幸在当年11月中旬病故。时年60。

韩彩凤在澳门转回来广西时，在地方上所做的公益事情如下：

1. 民国二十二年，起建上雷小学，命名为岐山小学，同时并建上雷街市亭12间，方便群众集市买卖交易场所。
2. 民国二十三年春，他和古木村廖玉廷共同出资，在古木坳山种植杉松林场一个，亩数不明，今归政府所管。
3. 民国二十五年，在柳州人民广场，起建红庙一座，即今柳州人民医院现址。
4. 民国二十六年他和东泉街张耀廷、黄日高等3人共建东泉武庙一座。
5. 民国二十七年，扩建东泉文岩，作当时抗日军用仓库。

覃连芳小传

覃连芳(1894-1959年),字武德。生于马平县四都金陵村(今柳江县百朋乡覃屯村金陵屯)。父奎元,为前清秀才,有妻3房,共生7子3女。覃连芳行4。幼读私塾。后考入马平县马邑两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蔡锷主办的桂林陆军小学。继而升入武汉湖北陆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曾参加新军与清兵作战。以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骑科。毕业后到南宁讲武堂任见习教官、分队长、区队长、中队长。以后调任广西省防军连长、营长、纵队司令。民国十年,投入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部任统领,随军驻广州。因他三哥覃连升在靖国军总司令沈鸿英部任职,刘震寰疑他是通敌,曾将他扣押。获释后,他投靠李宗仁,被委为营长、纵队司令。驻三江县时,曾在老堡口诱捕大批“土匪”,就地枪决。他父亲曾因此写信告诫他。他事父母孝顺,从此抓获“土匪”都交地方官处理,不再滥杀。

民国十五年,广西出师北伐,覃连芳任第七军军部通讯大队长(营级,辖3个连)。同年9月,第七军在江西德安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第九团团长阵亡,他被派接任团长。不久,第七军改编,他升任副师长。因与新桂系头子白崇禧不合,受到排挤,民国十六年遂申请公费留学法国,进入央里诺斯航空学校机械班学习。学成回国,任广西护党救国军教导团团长。民国十九年,为新桂系阻击蒋介石军朱绍良、毛炳文部入桂有功,升任少将教导师师长(驻柳州)。同年12月,他率部在柳州北部长安镇阻击红七军攻城。后调任陆军第一方面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师长。民国二十年驻柳州期间,兼任柳州建设处处长,曾主持开辟了柳州城内由西大路起,连接庆云路,直通东大路、贯穿城外东台路的大马路,还扩宽柳侯公园,建筑公园头门,修整罗池,重修柳侯墓等,又修立鱼峰南面上山石级直至山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二十四师官兵要求出师抗日,蒋介石命令他率部开赴黑龙江协助马占山打游击。因李宗仁、白崇禧不准他带走枪支弹药,部队开到全州被迫折回。

民国二十三年冬,覃连芳率领二十四师尾追长征红军入贵州境内,纵容官

兵抢购烟土，带回广西高价出售。民国二十五年，他因与军长廖磊搞僵关系，辞师长职。因曾留学法国，被委为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处督办，驻节龙州。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覃连芳被李宗仁委为三十一军副军长，兼一三一师师长。9月随师北上抗日。12月中旬，他奉命参加苏北明光一线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作战勇猛。1938年4月，他率部参加“徐州突围”，被派首先行动，以两个师的兵力突破涡河日军封锁，为整个突围部队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后他的部队与长官部失去联系。进入安徽后，粮饷没有接济，他就放任官兵掳掠，使当地人民蒙受灾难。同年6月，他因“徐州突围”有功，升任八十四军军长，属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在湖北应城一带打游击。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覃连芳率部突围到随县。次年4月，他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会战”，在襄阳、花园公路东段，重创西犯日军，迟滞敌军西进，掩护五战区完成包围布署。后因自恃有功，又与上司李品仙不合，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李宗仁念他对桂系有功，仅将他免职，派他任五战区中将高参。他愤不就任，奔向重庆。李宗仁派人乘专车追他，他也不回头，还骂李宗仁负义。他到重庆后，胡宗南曾邀他出任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因受白崇禧警告，不敢出任。后来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又曾到中央训练团任过两期大队长。

民国三十年六月，覃连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他原是实授中将，因团员中有5名现职上将，为方便领导，蒋介石特准他挂上将衔。后因大刀阔斧处置蒋帮嫡系将领（因此曾被蒋帮嫡系称为“南方白狼”），被蒋帮军政要人群起攻击，蒋介石又以“滥用权力”的罪名，将他撤职，并通报全国，永不录用。

覃连芳被撤职后，不久就回柳州开设“芳记”和“英记”两个锯木厂，在私宅“芳园”接待亲朋故旧，连越南的胡志明、阮海臣都曾做过“芳园”的宾客，在家乡柳江县金陵村，他还有田园和大水碾，也常回水碾居住。他不甘心隐居，曾写感怀诗云：“蜃居静待春雷动，会化鱼龙上天去。”

民国三十六年，覃连芳以广西机械工会名誉理事长身份，当选国民代表大

会代表。次年3月，他到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从此结识中国民主社会党头目张君勱。对该党的政治纲领感到兴趣。同年秋，他在柳州庆远一带与广西省保安副司令张任民竞选立法委员。因得不到国民党中央以及广西官方的支持，终于失败。这年冬天，在表姐李荫青劝说下他退出国民党，加入民社党，任民社党广西省委员会书记长。但无大活动。民国三十八年，广西省政府编印的《广西概况简编》曾称他为：“失意分子，但对军政界尚为有力分子。”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下旬。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飞回桂林。覃连芳曾到桂林谒见，但遭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冷语奚落，扫兴而归。5月，他的好友密报，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密谋要对他采取行动。第二天就匆忙带着四妾钟文英及钟所生之幼女乘飞机飞广州，要转赴香港。到广州当天，他往谒李宗仁。李要他留下一起干。他说他有病需要治疗，次日就买船票去香港。到香港后，住在弥敦道洗衣街181号，先与人合股开南国酒家，后来又自买一辆汽车做生意。

1959年，覃连芳老死在香港。临终前，殷殷嘱咐家人，一定要将他的骸骨送回家乡金陵村。1982年，其女覃赤丹遵遗嘱将骨灰送回柳江县百朋乡金陵屯安葬，受到当地县、乡、村领导及亲友的热情接待。（注：覃连芳生于甲午年十二月初三，换算公元为1894年；死于戊戌年十二月十六，换算公元为1959年。）

（柳江县志办供稿）

熊襄龙其人其事

罗怡林

熊襄龙(1895-1977年),壮族,马平县(1931年改柳州县)二都金磊村人,12岁到柳州读书,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毕业,应著名华侨陈嘉庚之请,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任校长。三年后回广西大学任讲师,六年后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保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学习,毕业后获农学博士学位,仍回广西大学任教,并升任教授,兼任广西省政府农业顾问。1947年任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农业处处长。

1948年,熊襄龙当选为柳州唯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南京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出力,此时,他不仅闻名柳州,也可算是广西的红人了。在此以前他的一生,可说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了。然而,自此以后到解放前的一段时期的坎坷遭遇却很少人知道。

南京竞选结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熊襄龙得到李宗仁赠送的金条一条,自南京返回广西,不知什么原因,他与当时的广西权贵有矛盾,又不愿拿钱出来消祸,以致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1949年3月14日,桂林地院刑庭开庭调查,传讯熊襄龙贪污案被告熊襄龙,由推事李江原在庭审讯,历时一小时许,因系调查庭,内容未公开发表。这是当时广西权贵对熊襄龙开炮的先声。

1949年5月20日,熊襄龙被桂林地院刑庭公开审判,庭长苏璧,检察警陈永烈出席,被告前任本省农林处处长熊襄龙、前该处技佐甘桂华及被告律师邹文蔚、赵徵麟等均出庭,到席旁听者达50余人。

陈检察官略称:“本案熊襄龙等所犯罪之事实约有三点:

一、熊襄龙利用职权将柳州办事处各农场所领之救济物资入其私人所开设之马鹿山农场;

二、熊襄龙嘱甘桂华在柳州办事处公款项下挪移1000万元,购买黄糖营利;

三、甘桂华为农林处技佐，而熊囊龙让其在马鹿山农场工作。”

庭长苏璧问熊及甘有无辩论，熊囊龙声称：

“一、起诉书所列者均无事实检据；

二、本案之告发人姓名无知，此种情形请庭上主持公道。”

辩护律师邹文蔚声称：“熊囊龙曾受高等教育，且任简任职务，平日并无贪污之劣迹，就检察官诉书中所列举之三点——辩护，并列举省府及各农场复文并认为无事实存在，请庭上宣判无罪。”

两周后，桂林地院刑庭庭长苏璧，推事李江原等出庭，传被告熊囊龙、甘桂华后，即由书记官黎广华宣读判决主文：

“熊囊龙共同连续对主管或监督之事务，直接或间接图利及预备侵占公有财物，处以有期徒刑4年，褫夺公权4年；甘桂华公共连续对主管或监督之事务图利，处以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公权4年。”

宣判后，囊、甘二人称当申请复判。

事后，办理该案检察官陈永烈说，他尚未接到判决书，不知所以减刑之理由如何，如接到判决书后，见理由不充足时，当依法申请上诉。

据熊囊龙的外甥廖某说，熊到南京参加“国大”选举后返回桂林，当时广西权贵要他拿出300两黄金，他不肯给而引起此贪污案。到被判刑后，不得不拿出几十两黄金，保释在外。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长江，战事逼近广西边境，人心惶惶，熊囊龙乘机只身逃往香港也无人过问了。以后不久，他的妻子儿女才接着去香港。他在香港一个中学任校长，他的侄儿熊天保跟着他当总务。任校长时间不很久，全家移居马来西亚，最后到新加坡定居。

熊囊龙走得匆忙，在桂林、柳州的房屋契约都遗失了，想申请退回也无根据。今柳州中国银行的旧址就是他原有的房屋。

他还有一个女儿因已出嫁，没有跟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甘肃兰州工作。1977年，熊囊龙病逝于新加坡。

写于1988年11月28日

当年柳州名士阚德轩

董咸熙

名闻龙城的阚德轩老先生，在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四十年代初期，被地方人士选举为柳江县参议会议长，作为他的助手，我任副议长。在和阚老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受教育和感染。虽事隔半个世纪，但他那修长的身材，慈祥的目光，和蔼的面庞，谈笑风生的形象，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阚老出身书香门第。年幼时，爱好琴棋书画，通晓诗词歌赋。清末，曾获拔贡功名，转民国，他专攻法律。民国初年，阚老深得两广总督陆荣廷器重，历任军法处长，广西审判厅厅长。民国八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任大理院院长。虽身居要职，而为政清廉，秉公执法，从未添置私有财产。后因时局动乱，陈炯明背叛孙先生，孙先生不得已暂时退居上海，阚老也寄居沪上。因受刺激过度，精神失常，幸得邓元义士全力照顾，才化险为夷。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看破红尘，奔赴四川峨眉山，加入道教，修心养性，念念不忘芸芸众生，以行善为他终身信念。

时局稍为平静，他回到南宁，被推为广西同善社社长，家中设有佛堂，所有同善社道友，集中念经，听他宣道。民国十九年，蒋桂战争，他任中国红十字会广西分会南宁妇孺救济会会长。当时滇军围城，鏖战数月，这是新桂系历史上有名的黑豆节。两军死伤狼藉，断手断脚，触目惊心，阚老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伤残者，能回家的发给路费。事隔一二十年，还有当年受恩者不断写来感激信。抗战前夕，他回老家柳州，又被推为柳州同善社社长，道友们常集中在寿板街（现小南路街委会）孔家听他讲道。

阚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据刘雄先生回忆：“他虽系科举出身，但其言行并无半点学究气派，抗日战争第二年，莫林记报局驻柳负责人莫贵朋，出资创办一小报，请求阚老命名，他执笔直书‘立鱼峰’3字为报头，并亲任该报总编。”除此之外，阚老对戏剧也有兴趣和研究。年轻时，曾登台演过反串；

1937—1938年，他到桂林同马君武、欧阳予倩从事桂剧改良工作。他编过《绿珠坠楼》《黛玉葬花》《梁红玉》《木兰从军》等剧，其中由小金凤在桂林主演、小飞燕在柳州主演的《木兰从军》，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忱，抗日情绪高涨，获得社会人士的好评，曾以“旧瓶装新酒”为题，登在《柳州日报》上面，赞誉改良戏剧的成功和对青年艺人的培养。后来小飞燕因婚姻不能自主，走上了绝路！阉老十分惋惜，做了一副挽联去悼唁：上联是“廿八年艺苑生涯，歌舞场中，相信洁来还洁去”；下联：“五十两黄金有价，污浊尘世，可怜求死不求生”。

柳宗元开化柳州，每逢清明节，柳州的文官和教育界人士，均往祭祀。阉老在柳州期间，不但去参加祀祭，而且在1947年写下了一首祭柳歌词（沈音谱曲），由教育局转发各中小学教唱。歌词是：“嗟嗟吾侯，远谪柳州。福我寿民，惠泽州流。植柑亭畔，种柳江头。柳水鹅山，炳耀邇州。”

阉老与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为北京政法大学同学。解放后，沈曾约阉进京参政，但阉已年逾古稀，足疾缠身，未能远行。柳州市人代会获悉，聘阉为特邀人民代表。

阉老的家庭教育，颇有独到之处。他要求弟男子侄做到“自强不息，勤俭持家”8个大字，并以此来鞭策自己。自幼跟随在他身边、给他抚养成人的胞侄阉维雍，在他教养和鼓励之下，在抗战中，为国捐躯，成为抗战烈士。现住中国民主同盟柳州盟市委副主委阉维端（曾任柳州畜牧兽医学校副校长、副教授）是他的次子；现任地区水利勘测设计院院长的阉维陶（高级工程师）是他三子。他们曾多次向我问及其先父生前的情况，特撰此文以示怀念。

清末、民国时期 柳州书画界简况

谢贤修

晚清之世，柳州文人享誉海内者，首推王拯。王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以户部主事屡充军机章京。咸丰中随同各王公大臣赴天津等地办理巡防事务，官至通政司通政使。拯工古文，为清末桐城派名作家，其文典雅凝炼而有清新之格，无桐城末流之弊。著有《渝斋文钞》十二卷，《龙壁山房诗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词》四卷，与其书画，并传于世。

王拯书法颜体，学颜鲁公《争座位》帖，正草书皆沉着雄厚，且其襟怀磊落，自有造诣，书法特具神韵，鱼峰冠山亭旧有王书匾额及楹联一副，联云：“坐收天马西来势，重踏金鳌顶上行”。抗战时惜毁于火。其画工山水，师法元人黄公望、倪云林，笔墨苍简清润，行笔飘逸，极少渲染，而恬淡有致，现柳州博物馆藏有其书画。

王卒于光绪二年，年 61 岁。

旧日宏丽的东门城楼顶层的檐下，悬有一块青底黑字大匾，书“出乎震”三字，款书“光绪六年”，下署“邑贡生秦绳祖书”这种擘窠大字，善书者难工，况“出乎”二字更难着笔收势，而秦绳祖运用他的功力，把乎字中竖垂露带曲钩写得入神入化，三个字如惊龙腾空，神采飞动，为城上高楼增光添彩，观者叹服。秦绳祖字其武，邑拔贡，乃王拯老师之子，与王拯略同时。绳祖之侄秦献廷，幼承家学，世传颜体，亦教书为业，其书法功底甚深，是从勤学苦练而达到有神有势之境。现今董咸熙先生家藏有献廷所书条屏 4 幅，系书赠董父海澄公的，字迹遒劲潇洒，墨韵传神，堪称佳品。

咸、同年间有举人梁廷辉，住映山街，善书法，教书为业，光绪二十五年，他已 80 多岁了，犹登东台山督修宝塔，但其作品已毁于民国十七年柳州大火。其子梁渭卿，亦业儒，嗜画，长于人物花鸟。柳州大十字街太阳庙有他的大幅壁画《达摩过江图》，大龙潭龙雷观《宝鸭穿莲》壁画也是他画的。这些作品

于拆庙时均毁掉。现梁渭卿之孙女梁培均，在新疆省政协工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其书法参加新疆、安徽等省区（区）展出皆获一等奖。

清同、光年间细柳巷有朱凤仪，邑庠生，号槐堂，雅好王羲之十七帖，能在行笔时并用指、腕、肘、肩之力使于笔端，书法简约飞动，昔鱼峰山观音阁有槐堂所书之匾及对联，已毁于火。其嗣名芾，字子垣，号柳条道人，亦秀才出身，书法名噪一时，山水初学王时敏，再学元人黄公望，墨竹学文与可，书法王献之。并皆佳妙。书画豪放宕逸，所书柳侯公园柑香亭大匾及对联，被誉为“南天一杰”，惜拆亭时弄失；龙家祠之匾联亦为其手迹。其蝇头细楷并皆佳妙，得者宝之。

曾获清末最后一次科举——光绪二十九年拔贡的胡纯照，字汉舟，书法与朱子垣齐名，住映山街。民国初曾任兴安、横县知事及局长等职，其人学识渊博，书法神逸奇纵，亦从十七帖入手。胡在临帖之前，默读数回，心领之余，下笔有神，所谓驱情使笔，俾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渗情入法，以创立自己独特风格。胡与朱书法妙处，在于字有神韵，他曾说过，“书贵有神”。笔者也亲自见过胡氏所书屏条，苍劲淋漓，神韵均足，观之使人情随字移，堪称妙品，卒于30年代初，书法传世不多。

严正衡，字秉钧，号同谱，清拔贡，住西门花门墩，书法端庄，有静穆之气。法赵孟頫，光绪年间为西门城楼书一木刻大匾“丽泽兑”悬于城楼正向西门大街，与东门之“出乎震”皆为《周易》《说卦》指方位之词，又柳侯公园罗池上旧日建有蓉镜亭亦称水波凉亭，乃陆荣廷所建，勒石纪其事，碑即严公所书，今毁。严曾书一联赠笔者之祖父，惜已散失。

在晚清科举人物中，有副榜莫汝封，号樾楼，其子举人莫伯襄，皆善书，俱业儒，旧更新亭及莫家祠等处有题书匾对，今已难寻。

谷埠街有周京雨，号春台，邑生员，教书为业，民国初年任县劝学所长，后随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为秘书，书法颜体，圆润苍厚，亦具风格。

塘头村朱卓峰，亦邑秀才，其人聪明雅静，宣统年间，开办河南小学，校址择谷埠码头东边北帝庙内。朱任第一任校长，喜书《正气歌》，拉堡、双桥等乡人皆仰慕其名。

莫萍舟，住莫家祠，善行书，师承赵孟頫，笔墨灵活，秀劲有致，气韵淋漓，旧日公园中思柳轩及船厅等处的对联横额，如“四时佳兴与人同”“此地有名山作主，令人想刺史当年”等，皆其手笔也。

周焕章，住黄竹巷，宅院颇广，称望族，辛亥革命时，柳州同盟会员起义推翻清道台及知府等官，夺取了政权，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周焕章任秘书长，其人精于书画，尤擅钟鼎文，在柳州堪称独步一时。钟鼎文较甲骨文粗，线条不是直来直去，而以象形取胜，后来又发现石鼓文，石鼓文即籀文，原为大篆，字仅数百，非有深厚书底不能作也。周焕章所书之钟鼎文，多书屏条，得者珍藏之。亦善画梅兰竹菊，以水墨胜，但不多作。周曾任公园管理主任，对园林培植规划，建树颇多，今柳侯祠所存《剑铭碑》，世传原碑失落，或云已在巴黎，或云民国十七年大火所毁。周以拓片重刻，得将原迹保存，今公园入门处两排桂花树，浓阴匝地，花时香飘远近，亦周焕章手植也。

龙怀枢，字鉴平，世居东门，潜心柳体，字法端庄严谨，尤工小楷，喜书中小楷条幅，民国初年任过柳州统税局长，更新亭上有他所书《冠冕龙城》石额。其子龙孝坚，书学魏碑，参以柳骨，端庄秀雅，亦为时人所重。

关铁舛，前清举人，住龙角街，讲学训徒。其子关伯安，父子俱以书法闻于时，书重汉魏风格，苍老挺秀，为邑中有数之魏体书家。

阙宗骥，字德轩，前清末科拔贡，民国初年任广西高等审判厅长，后任西南大理院长。家住中山东路，诗、书皆妙，书法淳朴端厚，多书匾额，桂柳一带，尚有手迹流传。

郑承典，字兰荪，清庠生，书香门第，曾任县长及广西边防督办等职，善画墨竹，亦工花卉，清新雅丽，书法亦潇洒纵逸，俱为时人推崇。

朱奇元，清生员，曾任马平、迁江等县知事，书法亦有名，劲利雄厚，有坚凝风格，工花鸟，所绘花鸟扇面，清新妍丽，惟不多见。

熊少丞，辛亥革命时之同盟会员，对古文词甚有研究，尤邃于易经，书以小楷为佳，多书手卷，端妍简静，自具风姿。

赵思雨，字春轩，聪颖好学，从事教育工作，曾代其父入匪窟为人质。为人风度潇洒，嗜酒，行草兼善，笔姿豪放，有宕逸神韵，自出一格，惜中年已逝，

笔者曾获册页数幅，今已佚焉无存。

覃连芳，柳州人皆知其名。覃好书，法康南海，康书特点为“重、大、拙”，以刚雄之气势夺人，独树一帜。覃武德专心以学，甚有造诣，亦具刚劲拙厚之意。柳侯公园曾有覃所书碑额数处，如“罗池”“罗池胜迹”等。

张启芳，家住北门大街，好学，笔不离手，其行书功力甚深，浑厚淳朴，时人重之。

柯传滨，字起渭，家中山东路，从事教育及军政界工作，书法柳体，端庄刚健。

张汉文，天津人，民国二十年间来柳创办中华书局柳州分局，张任经理，其书法宗自汉隶，敦朴古拙，天性流露，自具逸趣。昔柳州书画界朱午迟及何如坚等曾到张府作客。据张自述学书用功40年如一日，除舟车病卧之外，无日不作书。所长汉隶，功底很深。何如坚曾获得张书赠之四条屏，乃奖何应题作画得第一名之赠品。但此书已于“文革”时损失。但盛德萱先生昔与张汉文为同业至交，今仍藏有张汉文所书条幅数件，解放后张返天津病逝。

咸益书局经理李懋，亦与张汉文同以书法称著于时。

翁振翼，字云衢，原居中山东路，广西法政学堂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抗战后充任律师，为人慷慨，书学《石门颂》。翁以《石门颂》为主，兼习魏晋，故其书体不拘一格，数体皆精，且浑朴高雅，有奇拙之致，其手迹流传亦多。

周贞白与周道农，二人为伯季，贞白居长，道农行三，俱为柳州著名画家，贞白为杭州西泠画社成员。居罗池路周家祠内。贞白擅工笔山水人物走兽，道农擅花卉，尤工枇杷。贞白称清白道人，民国初年任广东造币厂厂长。后宦游苏杭各地，民国十年以后，兄弟皆崇尚道教，改着道装，椎髻明服，宽袍大袖，飘飘然有神仙之慨。民国十五年率子女回柳定居，笔者当时就读于周家祠书塾，因与道农之子绳祖相善。道人之画，师承董源、郭熙，下及明代唐寅、实父、清代沈铨、麓台诸家，风格古雅，纤细缜密。渲染细微，人物鸟兽、形象逼真，所绘人物仕女，金刚罗汉，及啸虎鸣鹤诸画，形态活泼，傅色典雅，落笔细而不膩，工而不板，山水多清新秀丽之意境，无世俗味。道农所画之枇杷，枝叶苍翠，果实逼真，见者喜之。朱午迟说道农的枇杷虽传神，但过于工细，是“做画”，此说不免偏见。盖工笔画多用皴擦之功，笔用侧锋，以干、湿、浓、淡、飞白

等多种笔调变化来表现山石树木纹理和折皱。笔墨要匀，水分要少，用墨用色重复致不单调而有韵味，且有厚重之感。道农的枇杷使人看起来仿佛是一束真的枇杷，就是有厚重感的效果。其实周氏二公亦画大幅水墨山水，昔周家祠堂前有大照壁，周贞白在壁上画大幅水墨山水，峰峦雋秀，烟树隐约，洵是佳作。30年代西泠画社来柳开画展，曾将周氏之作携至各省展出，其画亦多售出外地。画家蒋国镇曾见贞白题墨梅一幅“一圈一圈又一圈，千圈圈出万万圈。老树无极生太极。得来天上寄神生”并云此画现已流传至美国。如今在柳已难见贞白遗作，闻广西博物馆于60年代购藏数幅。市博物馆亦藏有道农之画，其家原有历代书画及周氏遗作四箱，连同周氏宗谱于“文革”时被抄洗一空，下落不明。清白道人晚年息影杭州西湖，解放后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年且90，卒于杭，其墓今在西湖，道农年80余，终于柳，有子绳祖，亦长于山水，卒年50余。贞白有女名周安，号金城女史，居桂林，亦承家学，长于山水花鸟，闻贞白在西湖售扇面画，人士争购，应接不暇，多情其女代笔云。

张席卿，住龙角街，向任文职，书画皆精，花鸟山水俱长，笔姿简炼，意境清新，有华岳之致，此公多才、善音乐文场，唱青衣，能操扬琴，以琴棋书画自娱。

肖劲华，湖南祁阳人，民国二十九年接朱瑞元之后任柳江县长，至三十三年离任，调省府参议，后任省保部组训处长。其人雅好书法，师承《颜真卿麻姑坛》并学王右军《洛神赋》，笔势遒劲，豪放泼辣，奕奕有神。当时州人多请其书写招牌及庐室别墅匾额，擅名一时。

朱午迟，原籍柳城县凤山，民国十三年左右移家柳州市亦是柳州人，先居东门，后居驾鹤山脚构庐，曰“午迟山房”，此人多才多艺，字学汉魏碑体，粗朴且豪放，有独创精神。并善写空心标语字，山水以小幅见长。所作“九头山”山水一幅，曾选送北京全国画展。又善画水墨牡丹，独步一时。对桂剧饶有兴致，前培新路曲园大戏院，乃其设计构筑，卒年70。

敖起絮，百寿县人，抗战时曾在桂林从徐悲鸿习画，后在柳任教，画花鸟师承张书旂，造形超脱，其创作着眼于写情、写意、写神。绘鹤哥栩栩如生，其画亦参加全国美展、此山水画现为何一帆收藏。

抗战之前，广西局势有数年尚称承平，陆续有人来柳举行画展。最盛大的西泠画社展出。数辆汽车满载全国名家作品，运至龙城中学礼堂张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近代大师如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齐白石、潘天寿诸家名作，及海内书画家精品，先后陈列，给柳州人士大开眼界，观摩者流连忘返，各画标价出售，任凭选购。如汪亚尘的金鱼，画鱼一尾定价银洋一元，购者亦众。一幅画最贵也不过大洋二三十元，机会难遇。所以这次展出轰动柳州各界人士。周贞白身着白麻布道袍，几乎每天到场应酬。

嗣后陆续有外地画家来柳举办画展，如杜其章、陆苍夫等，详情就记忆不清了。柳州画坛活跃，个人或联合展出作品的颇多，如：

欧阳华宗，任柳税捐稽征局长，以花鸟擅长。

沈 樾，桂林人，1937年任柳州区税捐局长，善画鱼，所绘鱼群如在水中游动，形态活泼，着意渲染水纹，以加深表现力，使观者有真实之感，是其独到之处。

张芳亭，住李子园，长于山水，法元人倪、黄，笔墨醇厚，勾勒皴染，秀逸古拙。

曹墨侣，抗战时流离柳州，金石书画皆精。长于山水，笔法老练，设色古雅，传统技法功力甚深。亦擅长梅花，书法亦佳，以行草胜，后移居南宁。

抗战期中，文艺工作者多集中桂林，画家来柳展出亦众。笔者当时在桂林从岭南艺苑周千秋先生习画，因而深知岭南派大师赵少昂来柳画展，据说赵之展出很成功，给柳州画界增加动力，吸引各方人士前往参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及柳州军政首要，都亲临观看赵的作品。赵的山水不用传统皴法，而是用墨用色时线条留向的方法，较之用笔墨皴染更显气势磅礴，立体表现力更强，观者认为前所未见，赵在柳展出后赴重庆。嗣后周千秋偕夫人梁灿英来柳画展，周为岭南派花鸟鱼虫专家，功力深厚，下笔灵活，章法新颖，精于用色，所绘金鱼、鲤鱼、孔雀、花卉等，跃然纸上，具备形质美、性情美、神采美之感受。抗战胜利后，周夫妇已赴美办学。

抗战胜利后，柳州经济文化教育逐渐恢复，画家来柳工作亦多，画坛颇形活跃，较著者如：

钟其华，柳州人，世居东门，少年时负笈沪杭美专，精工花鸟，淡雅自然，

有华岳之风，晚年以画红棉称著。

龙敏功，桂林画家龙月庐之子，耳聾且哑，山水极有造诣。其画直超乃父，上承元代四大家，山水画登堂入室，书法亦佳，亦善作诗，“文革”中被斗死。

李漫涛，柳州人，精于山水，皴法灵活，敷色典雅，下笔随意赋形，所谓墨具五色，笔有生活。曾画棉花并题诗云：

“人画我也画，人笑我不怕，人画梅兰竹，我要画棉花。”

何如坚，柳州人，现仍健在之老画家，精于花鸟，兼作山水，其桃花鳊鱼图立轴，罗池艺苑评选第一名，曾被评为广西民间艺人最优秀作品，此画为黄国仁收藏。

曾亚中，柳州中学职员，擅指头画，花鸟鱼虫，墨韵潇洒，意趣盎然。

陶尊五，原中渡人，来柳任教，书画皆佳，花鸟山水兼长，运笔自然，设色淡雅，书法尤擅名一时。

邓俊群，原在桂林美专任教，来柳亦任教师，以花鸟专长，所作梅花、墨竹、葡萄等，擅名一时。

符少孟，以篆刻著称，广州美院毕业，从事商业广告商标设计，亦兼习国画，光复时来柳开业家私设计，为美术研究所工艺师，篆刻艺术之行家里手，刀法流畅，构思精巧，线条凝重而浑穆，且有空间感，每件作品，皆以严谨处之，且乐意为书画界服务，得者宝焉。

尚有来柳画家胡素石、陆田、余之、陈华、周志清（女），本市书法家如叶中语、罗沛霖、熊公白等亦活跃于艺坛，各有造诣。

1949年，在柳的诗人画家发起成立“罗池艺苑”，地点附设在中山东路旧红十字会内，恭推郑兰生、阚德轩、周道农为艺苑顾问，朱午迟、敖起絮、何如坚、邓俊群、关伯安、曾亚中、刘光汉、陈墨等为理监事。朱午迟、邓俊群为理事长，何如坚为理财。另有会员曾冰涵、欧阳藩、龙启凤、梁镇海、陶尊五、叶倡梅等。联书画诗钟为一体，共约30余人。每人每月交会费民银毫2角，由评选小组郑兰生、周道农等出花鸟山水画题，多是以唐诗一句为题，一星期后展出作品，书画琳琅，互相观摩，评选出第一、二、三名，次日在《柳州日报》发表，并给奖励。另一项活动搞诗钟，当时爱好者参加颇多，推举阚德轩、

郑兰生、骆一樵、朱午迟、周汝为、欧阳藩、龙起凤、陈雨甘、刘本等为评师，每比收投稿费银毫5分。每周放榜一次，取录二三十人不定。最优的列为：冠、亚、殿军，后又增设参军，获奖从优，其余榜中获取者，得回稿费，主办诗钟事务者为罗修五先生。

诗钟题目，以旧体诗由艺苑出句首字对，以后按古格调式如“鹤顶、燕颌、鸳肩、蜂腰、雁足、魁星点斗、碎锦、笼纱……”。诸格调由各造就七言对句，每次放榜，民声晚报均在报上发表。在接近解放前，每期都须经过柳州警备司令部审核，甚至删除内容，因此投稿者就由盛而衰了。

现在，市政协尚存罗池艺苑理事照片，过去的《中国美术年鉴》保留有艺苑理监事会的名单。

由清末迄民国，柳州的裱画店，以组云斋最老，此后有莲香斋、李芳华等店，裱画亦兼售画，画家可委托画店出售。而裱画店标明“苏裱”，用料、款式、方法与苏杭相同，但业务不十分兴盛，因而裱画店纸扎也一并兼营，为迷信服务，承扎各式灯笼。遇上中秋和春节、三月三花炮节等扎出各式灯笼，彩花炮屏、台阁故事、狮子龙灯等，争奇斗艳。还专门有一些民间画师，在台阁炮屏及纱灯上绘出山水、人物花鸟，还有整套故事，如“群英会”“花木兰”“穆桂英招亲”“甘露寺”等等，游街时万人空巷，鼓乐喧天，彩灯照耀，十分热闹。

另有少数民间画师，专门为纸料店绘喜庆对联。清末及民国初年，民间有嫁娶寿辰喜事，亲友皆送喜联，这些对联先用金粉、银粉或彩色粉绘上龙、凤、花瓶等吉祥事物，再用墨书联语，悬挂时有一种热烈祝贺的气氛，也具纪念价值，有些人家婚庆过后很久仍在中堂悬挂这些屏联，民国二十年后，逐渐用玻璃镜画代替，嗣后就蔚然成风了。

以上所述，皆解放前情况，笔者愚鲁，且过去多在外地谋生，遗漏或不实之处仍多，祈请关心文史同志，赐予指正。

争取秦镇等人投诚的情况

高天驷 遗稿

1949年11月25日柳州市获得解放。为了维护城市的治安和支援前线，在军管会 and 市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地下党城工委征得驻柳部队的同意，于同月29日成立了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我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就任后，我写信给躲藏在里雍、运江一带的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秦镇（秦镇是11月24日半夜弃城逃跑到乡下的），向他宣传我党的政策，晓以大义，鼓励他弃暗投明。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秦镇接受了我的劝告，于12月5日带着10多个随从和枪支向解放军投诚。12月12日，柳州市军管会成立，19日，市人民政府对外公开，治安委员会宣告结束。我被任命为副市长和柳州专区改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栗在山政委和魏伯市长，当时柳州市属柳州专区管辖），专署公安处处长周海如为主任秘书。

改编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武装力量进行统战和敌工工作，争取他们向人民政府投诚或接受改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由于我是柳州人，对地方上的人事情况比较熟悉，也有那么一点影响。党组织指示我利用这个关系和争取秦镇投诚的经验，开展这个工作。

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隐藏在柳州地区的一些地方。国民党桂绥二支队司令、柳州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林秀山及其胞兄林燕山、雒容县县长王公吾等人，都隐藏在鹿寨、雒容一带待机而动。于是我多次写信给他们，讲清形势和政策，规劝他们从速猛醒，向人民靠拢，做个识时务的俊杰。王公吾和林燕山听从了我的劝告，先后在1950年的一二月间出来向人民政府投诚（王公吾带了十几个伪自卫队员投诚，林燕山摆脱其兄弟的控制独自出来投诚）。

秦镇投诚后政府安排他在改编委员会当改编委员。1950年1月间，秦镇写了一个报告给我，要求准许他请假去香港与其妻子团聚。当时柳州地区的土匪开始暴乱，我担心他反水，“放虎归山”后果严重。经和周海如研究后，我以

治安方面的理由以及他在旅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为托词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劝告他安心下来为人民做点好事。过了不久魏伯市长拿着秦镇的报告对我说，秦镇想去香港。我说，他已找过我，我不同意去。魏市长听了笑了笑就走了。大概是春节后的一天，秦镇满腹心事地恳求我，要到我家和我谈话。我想，秦镇一定是为去香港的事想搞点什么名堂。为了防备这一手，我事先通知市人民政府秘书李立民以及沈章平、陈如平等同志，在约秦镇会晤的时间先到我家等候，当秦镇一进门看见客厅里坐满人时，皱着眉头，客套一阵之后，他便拉我离开客厅走进内室。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几根金条放在桌上对我说：“你对我恩重如山，这点薄礼，请你收下，还请你高抬贵手，成全我到香港与妻子团聚吧！”我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面对着秦镇和这堆黄金，我感到人格受了侮辱。共产党员不是金钱的奴隶，你秦镇看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我本想怒斥他一顿，但考虑到统战政策，于是便压下火气大声地朝外面一喊：“喂，大家进来呀！秦镇先生自愿献金条给政府啦！”李立民等闻声入房后，我说：“我代表市人民政府接受秦镇先生献出的金子，并感谢和表扬他的进步……”接着由李秘书当众清点金子的数量，嘱咐他明天亲自携金子到市政府物资接管科缴交。此刻的秦镇只好笑着讲了一些客气话。事后，我们立即将此事向组织如实汇报。第二天，秦镇到政府交了金子。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魏伯市长根据党的政策和秦镇的具体情况，才批准秦镇出境到香港……

1974年2月25日于南宁

（刘道文记录）

附录：

《广西日报》1949年12月9日的报道伪柳州警备司令携金投诚

【本报讯】本月5日原敌柳州市警备司令亲自带黄金30两，投诚我军。

《假凤虚凰》引起的一场风波

张正民 蒋霖

1947年11月柳州金门戏院(红星剧场)上映一部《假凤虚凰》影片。这部影片在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大城市上映时,都曾遭到当地理发工人强烈的抗议。当此片将要到达柳州时,金门电影院在浮桥头胜利大厦旁,张挂出的海报广告被理发工人李惠初、窦永源、苏宝球等人几次打跌,同时在影院附近,有苏宝昌、陈榕业、李秀初、太山王等人所率领的一批批理发工人,在街上传播:“如果影院上映这部片子,我们就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砸烂影院。”

《假凤虚凰》是部喜剧片,由石挥和李丽华主演。影片的主要内容是由一位技术高超的三号理发师(石挥扮演)在同行友人的怂恿支助下,追求一位漂亮年轻而颇有风度的“小姐”(由李丽华扮演)而展开的。而这位“小姐”其实是一位贵妇人家的佣人,由于年轻漂亮,聪明伶俐深得贵妇人的钟爱,执意要帮助她找到一位年轻英俊有钱有势的丈夫,因此,把她打扮成一位“小姐”,一切的挥霍穿戴均由贵妇人负担,男女主角双方都互相隐瞒自己身份,可是,在相互交往中,又不知不觉在行动上流露出各人职业上的习惯动作。如男主角将外衣当成理发的围布搭在腕上;把领巾当成围领毛巾搭肩上;把领带当成烫刀布使用,到“小姐”家做客,看见贵妇人在梳理头发,自己也不自觉地帮上了忙,“小姐”也同样在行动上暴露出自己是佣人的动作。石挥、李丽华的演技自然而逼真,每当他们暴露渲染自己本能习惯的镜头时,都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过分的渲染的确有一些丑化理发工人形象的镜头。

影片到达柳州,上映期迫近。金门影院的经理(忘记了姓名)着急了,他的海报广告几次被人打落,理发工人在映院周围活动,罢工进行示威游行,还要砸烂映院,经理逼着去请求国民党政府支持调解。负责处理这事件的是两个机构:一个是柳江县府社会科,科长是王继光;另一个是国民党柳江县党部民运股,股长是农超能。这两人发动召集金门映院经理,理发工会理事长林启明、

周献禧和妇女会的罗炳莹，在党部会议厅进行初步会谈，商讨调解方案。其结果是：（一）召集有机关、团体以及理发工人和妇女会推选出的代表，参加金门影院首场试映审查，看完影片后马上召集会议，由大家提出哪些是丑化理发工人和妇女的镜头，展开辩论后决定剪去，但不能使整个影片肢离残缺；（二）影片放映时，每场都要送一定的入场券给理发工会及妇女会，进行监督；（三）放映此片的收入，要捐赠一部分给理发工会建造会址；（四）在放映的过程中如有什么意见，即速向两个机构反映，不准闹事，由工会负责向理发工人传达，发现有闹事行为，即以破坏社会治安论处；（五）将处理过程行文上报县府、党部、专署备案。

在这个时候，新经泰美容院的李国强、苏保昌理发店的苏保球，曾到专员公署找到保安副司令张正民陈述意见，张嘱他俩转告全市理发工人：“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的，希他们遵守社会秩序，不要将事态扩大！”张并下到县府、党部了解处理过程。

看完首场放映后，专署秘书室主任俞肇傅及各机关、团体、理发工人妇女会等代表均集中在金门影院楼上会议厅进行座谈，提出那些需要剪去的镜头，经过讨论定案后，交由影院执行。第二天将会议决定剪去镜头的影片再行放映，大家认为符合会议决定后定案，以后每天各场放映，都要送入场券给理发工会和妇女会进行监督。

影片放映的第一天，为了防止闹事，柳州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宪兵队派出大批武装和便衣布置在影院内外，影院对面民房楼上的窗口，还安放有两挺机枪，直到放映结束，终未发生事故。

经此一闹，影院一天连续放映数场，场场暴满，连两旁的通道均站满观众，散场和进场观众，秩序井然，影院获得了巨额利润，也如约给予理发工会一笔筹建会址款项，在尚未找及地基时，理事长林启明将这笔款拿去放债，以后在青云路买得地基建造会址时，林则以影剧院所给的数目结算，未将所得利息一并列入。

瞻仰烈士陵园回顾剿匪斗争

蒋宝礼 段润田

1989年元旦，回到故乡，40年弹指一挥间，故地重游，思绪万千。来到龙潭公园，快步走向陵地，瞻仰最后几排的146师78名烈士，他们来自436、437、438团，师警卫营、师教导队（军干校）。有67人是在剿匪战争中重伤不愈牺牲的。有11人是在艰苦的剿匪战斗中积劳成疾病故的。

走到管在和同志的墓前，使我回忆起1950年土匪暴乱的最初岁月，这位28岁的山东籍连指导员，是来沙塘军干校一中队深造的。3月的一个晴天，他和两名战友拉板车去长塘买菜，返回过山坳时突然遭到土匪袭击，管在和同志奋不顾身地和敌人夺枪，两名战士脱险，自己腹部被击中，重伤而故。在陵地上，找不到436团一营营长的陵墓，也看不到三营机炮连火箭炮班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陵墓啊！有更多在剿匪战争中当场牺牲的烈士，没有进到烈士陵园地。

登山远眺，环视群山，40年前的剿匪战斗重现眼前，在那崇山峻岭中，有无数老战士的足迹，有他们洒下的血和汗，还有许多烈士们的忠骨英灵。

解放柳州仅仅一个上午，然而，剿匪战争却历时一年半，牺牲负伤的指战员成百上千，他们为柳州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生命和鲜血，40年后的今天，柳州已成为广西工业的中心，经济繁荣、交通发达，这不就是烈士们为之献身的目的吗？烈士们安息吧！

纪念烈士，怀念战友，庆祝柳州解放40周年，使我回顾起剿匪战争的片断。

解里雍之围

1950年7月上旬，里雍周围各村土匪暴乱。农会会员被杀，所余百名会员，逃到里雍区公所，据栅死守，2000余土匪包围了里雍，占领三面制高点，炮击墟场引起大火。并不断发动攻势，区政府及百名农会员危在旦夕，王区长星夜泅水过河，送出情报。

436团三营七连闻讯自柳南赶赴营救。436团二营五、六连奉命自三都出发救援。

1950年7月10日，我和4名军干校学员，由二营通讯员护送至三都，追上行动中的二营。次日晚就随部队出发，冒着倾盆大雨，雷鸣电闪，向里雍进发。

七连提前赶到，土匪让开山口，七连未察觉，冒然进镇，土匪依仗人多，重新抢山头，占山口，将七连也包围在镇内，七连指战员怒火万丈，但三面是山，一面是水，土匪居高临下，仰攻不成，3名战士负伤，2名农会会员负伤，只得据守。当夜，七连向山口发起夜间突袭，六〇炮、掷弹筒一齐轰击制高点。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

7月13日拂晓，当五、六连赶到时，土匪已逃之夭夭，二营埋怨七连性子太急，否则就可以“包饺子”，歼灭敌人了。

进剿大瑶山

1950年7月底，五、六连在穿山休整。

1950年8月初，盘踞在大瑶山的2000多名土匪，占据了榴江县城（现寨沙镇），切断了桂柳公路。县府人员依托高大坚固的石砌炮楼，固守待援。436团二营四连机炮连自柳北首先驰援，二营五、六连自穿山经柳州车运鹿寨，冒雨夜进。但土匪已撤回瑶山。

我们二营集结县城，据情报不断出击，但都扑空。每当集市日，土匪又进城捣乱，民匪难分，我军只能固守营门，同志们义愤填膺。

1950年8月中，孙副师长带警卫营三连及电台来榴江，亲率二营剿匪。他先用诱匪攻城之计，匪未就范，后率全营近千余人出城西，折东南，迂回瑶山中部，经两天三夜急行，前卫四连在甲江、长二间咬住敌匪一部，经一上午激战，歼匪30余人，然匪首林秀山使金蝉脱壳计，率另一部向相反方向脱逃。我们二营沿瑶山山脊，自六段向北追去，越过桂柳公路，直抵驾桥岭东南之黎村南源地区。虽准确扑捉到敌群，但未能完成合围，匪已趁星夜散逃，只俘零星散匪。据俘敌供，林匪并未北上，仍在瑶山中。我军又连夜出发，分四路返回瑶山，沿山脊两侧搜索前进。我所在之六连，自忠良沿瑶山东侧，从北向南搜索前进，

在大垌附近搜山时打响，俘敌 20 人，击毙 1 人，我右臂下负轻伤。全营进至罗丹、桂田、长垌、同庚，一线撒网设伏，并以小分队搜索，但土匪藏枪化民，难以区分。此时战士多病，疟疾、拉肚、吐血，尤以烂脚者最多。1950 年 9 月底，全营沿瑶山西侧返回，在头排以西沿公路经四排返回榴江县城。

剿匪战争的重要转折

1950 年 10 月后，剿匪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是志愿军出国，连战告捷；二是毛主席亲自部署广西剿匪，由疲于奔命的普遍进剿，转为集中兵力，巩固重点，组织庞大武装工作队村村驻兵，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并调 21 兵团支援广西。1951 年 11 月，我抽到工作队，在柳江县乐山、思练、三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大批受骗青年自新登记，顽匪则无处可藏，向偏远山区逃去。

1950 年冬，九万大山、苗山、瑶山及十万大山等，山区顽匪跳了出来，大量集结，整编建制，发袖章，建电台，选空降场，九万大山南北，苗山境内，一片喧哗，然而，土匪此举，恰恰形成我军对其大包围之势。

九万大山前的激战

1950 年 12 月，436 团二营长由师侦察科长曲春担任，他是山东人，爱人柳州籍。他果断刚毅，掌握匪情，胸有成竹，行动迅速，因而仗仗打响，每战有获。1950 年 12 月中，率二营自榴江猛扑拉洞，歼匪 40 余。立即闯入太平、泗顶地区，与顽匪周旋追剿于山岭岩洞，俘敌上百，击毙数十人，我军伤亡十数人。而后回师柳城，留下伤员、俘虏。

1950 年 1 月初，西进罗城。六连在罗城附近的小煤村，捣毁伪县党部（已挂出牌子），匪首等仓促向九万大山逃去，但其小老婆、坐骑被我军抓获，女扮男装之密探被战士击毙，搜山抓住顽匪均就地处决。六连还在搜索，曲营长已率四、五连飞兵四堡。

次日拂晓，四连尖兵班（四班）接近四堡，敌匪却未得到情报，20 余名戴袖章徒手土匪正在村前沟边洗脸，四班不发一枪猛冲过去，想乘势闯入大院，但匪逃回大门，值班机枪立即封锁大门，四班投弹，大门内外留下 6 具敌尸。

此时，大院两端高大炮楼机枪也已射击，四班三面受击，跳入死角，进退不得，十分危急。前卫排赶到，立即以机枪与两炮楼火力点对射。以缓解四班之危。

曲营长来到，即令五连先抢占各山头制高点，完成包围，四连全力主攻。但地形不利于攻而利于守，大院四角炮楼坚固，构筑巧妙，难于靠近，爆破不成反遭伤亡，敌匪兵器较精，训练有素，射击准确，战有章法，十分顽固。四班进退不得，激战一早晨毫无进展。

正在研究战法之时，四班长示意要机枪掩护，他一跃而起，将外墙炸开一个洞。全班跃入，以爆破和火力，逐屋争夺。营长抓住战机，令四连派一个排增援，从屋下打向炮楼底部。午后大院前两炮楼被炸毁，正面枪声已停，道路敞开，四连全连投入。守敌依托后院两炮楼继续顽抗，并使出新战法，逐屋防守，使四连伤亡急增。曲营长令采用连续爆破，破敌新招，又派五连一个排增强。此时炸药用尽，急派驭手及坐骑取炸药，11时往返80公里，送到后马死，驭手吐血。攻势从凌晨3时重新开始。第三座炮楼被炸时，另一炮楼上下一片骚乱声，沉闷的手枪响声，后又平静下来，继续顽抗，并点火阻挡我军接近。曲营长将计就计，命令将火引向炮楼，以火攻楼。敌匪一片哭叫，但机枪仍拼命射击，直到枪眼冒出浓烟，炮楼成火楼，火光映红山峦，子弹烧炸如鞭炮，焦臭散发满山谷。

战斗结束，四堡大院一片瓦砾，敌匪300余人已成焦尸。四连伤亡30余人，其中步兵班包括正、副班长伤亡过半，他们掩埋好9名战友的尸体，绕坟一周，唱着战歌，迎着朝阳，告别东去。

围剿大苗山

1950年冬，大量土匪已集结于大苗山。九万大山前敌匪受我军沉重打击后，也纷纷逃向苗山，1951年1月底，全营集结于融水县。

1951年2月的一个夜晚，全营出发，六连前卫，沿河西进，经四合、四荣直扑元宝。沿途被烧苗寨随处可见，30、20散匪不时相遇，但我们均置之不理，只愿强行军。次日傍晚到达，立即发起突然攻击。匪窝一片混乱，死伤遍野，电台、袖章、武器满处乱扔，活着的向元宝山高峰逃去。其晚餐糯米腊肉，热

气腾腾，喷香扑鼻，为六连所食用。饱汉追饿鬼，翻越海拔 2000 米的元宝山，直追到黔桂边界的洞头以北一个深谷，敌匪再也走不动了，躲在深谷中。此时，我军掉队也很多，拉开距离 10 数里，紧紧追在匪群后边的仅一个排，因而只能扼住山头。全连到达时，天色渐黑，约 9 点发现深谷对面山上，火光点点，营长判断是友军，命发信号弹，果然，对方也升起信号弹。再命司号员联络，号声传去，对面传来悠悠号声，司号员立刻报告说：营长，他们是 521 团。全营上下沸腾，欢呼“会师了”。

深谷下，敌匪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听到号声，更是绝望，上吊、开枪自杀不断发生，谷底传出阵阵凄凉的哭声。曲营长又命令组织广西籍战士分别用壮语、客家语、柳州语喊话，少数土匪应声而出，但大部不动。营长又命投降的土匪和战士下谷喊话，他们喊着名，有的是喊亲人，喊得最急切最悲凉的是父亲喊儿子。山谷中一片喊声，很像喊魂，催人泪下。这时，土匪 10 人、8 人成批投诚，围困 3 日，全部解决。投诚中有江苏人。战士们领着这些解放过来的同胞，走出深谷，爬上山顶，正好迎着初升的阳光。

匪首何某逃潜，二营全营以班为单位，展开百里范围，撒网设伏达一月之久。我领六班住甲烈，发动群众，组织搜山。一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有一个苗族老人背着两竹筒在三排防区出现，说是赶集去，引起战士怀疑。经排、连盘问，正是何匪。至此，大苗山的围剿胜利完成。接着是休整、评功。

1951 年 7 月，436 团全团凯旋回柳。当月，146 师全师离柳州南去。不少土匪自新入伍，仅我班达 3 名。1955 年我再次吐血离队时，自新入伍的战士不少已当班长，其中一名已成为六连事务长。他们纷纷成长为我军基层骨干。

写于 1989 年 3 月 28 日

月朗明如新
 漢法可及此
 同治庚子年
 秋

建國仁元寺
 居室當師衛公子

世家只數富平侯
秋連平泰長

建國仁元寺
 龍文照日家聲蔚

驥三賅雲甲第寫
建國仁元寺

